



中评周刊 | 第 103 期目录

专题 | 大学精神与教师尊严：文明社会之底线

1. 贺麟：学术与政治 P. 2
2. 罗志田：大学的精神与定位 P. 7
3. 徐显明：把尊严和权威还给教师 P. 16
4. 梁文道：大学教育的“雾霾”从未散去 P. 23
5. 左玉河：学术自由：现代大学独立问题百年审视 P. 29

观点文章

1. 盛洪：法治才是核心技术 P. 32
2. 李伟光：现代治理、现代税制：征税、用税与财富创造 P. 40
3. 朱海就：哈耶克如何看经济学家的使命 P. 46

随笔散记

1. 茅于軾：回忆我的中学教育 P. 50
2. 金雁：集体失语的时代 P. 55

读书

- 肖雪慧：“我们人民”：国家命运的最终主宰者 P. 60

审美苑

1. 九璃：尼古拉·普桑的两幅 Et in Arcadia Ego P. 66
2. 网文：辛弃疾的剑和词，南宋的一曲慷慨悲歌 P.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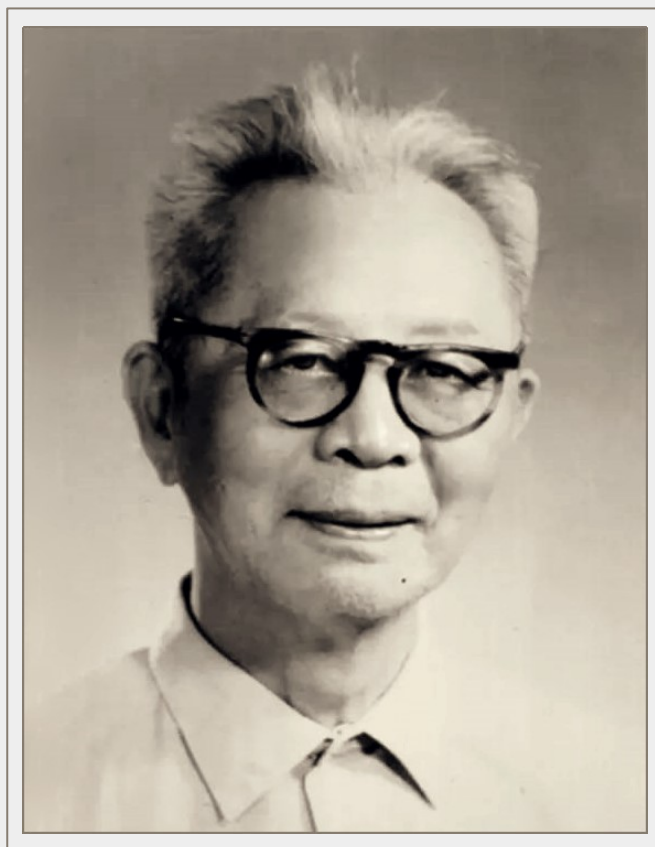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P. 76

订阅 | 往期下载 P. 78

贺麟：学术与政治

[贺麟（1902—1992）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本文摘自《文化与人生》1946年商务印书馆]



贺麟

（一）

“入国问禁，入境问俗”，是我们先民提出来表示走进了一个文明的独立的国境里，为尊重该国的礼俗起见，所应取的态度。我觉得应用这个原则来表示尊重学术的独立自主所应取的态度，实在再好不过了。因为每一门学术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习俗或传统。假如你置身于某一部门学术的领域里，妄逞自己个人的情欲和意见，怪癖和任性，违犯了那门学术的禁令，无理地或无礼地不虚心遵守那门学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你就会被逐出于那门学术之外，而被斥为陌生人、门外汉。一如寄居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友邦里，假若你违犯了友邦的禁令，不遵守该国社会上共遵的礼俗，就会波驱逐出境一样。不幸学术上的独立自主之常受侵犯，一如弱小国家的主权之常受侵犯一样。宗教要奴役学术作为它的使婢，政治要御用学术作为它的工具。贵族资本家也常想利用学术作为太平的粉饰、保持权利的护符。所以学术的负荷者要保卫学术的独立自主，以反抗外在势力的侵袭，就好象有守土之责的忠勇将士，须得拼死命以保卫祖国一样。

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

(二)

所以一谈到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同时在某种意义下，政治也是独立自由的，它也有它特殊的领域，神圣的使命，它占有它的规矩准绳，纪纲律例，它也需要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豪杰之士来争取保持它的独立自由。政治没有独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导、统治、推动整个社会国家的经济、行政、教育、外交、军事等一切活动。

学术事业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担当的，政治事业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胜任的，学术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养，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养。长于政治的人，不一定长于学术，同样，长于学术的人，也不一定长于政治。许多专门学者，学问尽管很好，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会有伟大的表现。有时甚至有学问愈好，而政治能力愈坏的人，因为知与行，知理与知人，治学与治事，虽不无相互关系，但究有不同，需要两套不同的本事。大体上说，须得分工合作，而不易求兼全之才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主张哲学家作国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有科学、哲学陶养的通才，倒不失为很有深意的说法，如果误解他的学说，以为最好的学问家，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那末在实际上政治恐不免贻误于书生迂阔之见，而理论上，也就忽略了学术与政治各有其独立自主的范围了。

(三)

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独立自由，两者彼此应当互不侵犯，然而学术与政治中间，又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失掉了这一种联系、就会两败俱伤。

通常一个上了轨道、自由独立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因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饮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轻蔑、抹煞、鄙视学术，那么这个政府就渐渐会成为“不学无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会塌台的。

由此足见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我们说学术推动政治，并不是说单是学术界少数学者教授先生们，就可以担任这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意思是说，学术的空气，学术的陶养，必须要漫贯穿于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的生活之中，就是说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都曾经多少受过学术的洗礼，并且继续不断地以求学的态度或精神从事政治，以求学养的增加，人格的扩大。政治是学术理想在社会人生的应用、组织和实现。也可以说，政治是学术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事实，由小规模而大规模，由少数人的探讨研究到大多数人的身体力行。政治没有学术作体，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学术没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数人支离空疏的玩物。

因为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任何建国运动，最后必然是学术建国运动。

离开学术而言建国，则国家无异建筑在沙上。学术是建立国家的铁筋水泥，政治上所谓真正的健康的“法治”，或者儒家所提倡的“礼治”、“德治”，本质上皆应当是一种“学治”。“开明的政治”就是“学治的政治”。离开学术而讲法治就是急功好利、残民以逞的申韩之术；离开学术而谈德治，就是束缚个性、不近人情、不识时务的迂儒之见；离开学术而谈礼治，就是粉饰太平、虚有其表、抹煞性灵的繁文缛节与典章制度。

学术既然成为政治的命脉，所以中国学者有所谓“学统”、“道统”与“政统”、“治统”的分别（参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各人贡献其孤忠以维系他自己所隶属的“统纪”。有时二者不可兼得，深思忧时之士，宁肯舍弃“政统”的延续，以求“学统”、“道统”的不坠。譬如孔子最初也未尝不想作一番武王、周公的政治事业，然而时势已非，他就退而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以延续学统、道统，担负“素王”的工作。顾亭林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一朝一姓的兴亡或统治者的兴亡是食一朝一姓之俸禄的当政者的责任；而有关天下的兴亡，亦即学统、道统的兴亡，人人都有责任。他这种思想，当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特别有其苦心与用意。和他同时代的王船山，以民族的命脉，学统的维系自命，因此有同样的抱负。王船山说：“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见《读通鉴论》卷九，下同）。足见在一切政治改革，甚至于在种族复兴没有希望的时候，真正的学者，还要苦心孤诣，担负起延续学统、道统的责任，所以王船山又说：“当天下纷崩，人心晦否之日”负延续道统学统的使命就是“独握天枢，以争剥复”的伟业。从学统、道统的重要以及其与政统的关系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政府尊重学术，就是培

养国家的元气，学者自己尊重学术，就是小之尊重个人的人格，大之培养天下的命脉。

(四)

学术的独立自由，不仅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使政治成为政治。因为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来支持政治，则政治亦必陷于衰乱枯朽，不成其为政治了。所以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不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尊重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亦即是政治家的责任了。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特别避免为好雄霸主所利用，而陷于杨雄、蔡邕的命运。故有时学者必须超出政治方能保持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但须知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和政治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和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彼此分工合作，就好象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假如学术和政治脱了节，就好象原始时代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不能收分工合作团结一致的效果。这样，决不能产生近代的学术，也不能产生近代的政治。

学术界常常有一些人，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视政治为污浊，惟恐怕政治妨碍了学术的清高。这种态度足使学术无法贡献于政治，政治不能得学术的补益，因而政治愈陷于腐败，学术愈趋干枯寂。这种与政治绝缘的学术，在过去的中国，颇占势力，如象乾嘉时代的考证，不过是盛世的点缀，南北朝的玄谈，也不过是末世学人的麻醉剂。无补于治道，也无补于世道。

这种学术，表面上好象是超政治而自由独立，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境界。真正的学术自由独立，应当是“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学术到了这一种程度，它就能够影响和支配政治社会，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假如我们奉考据玄谈为学术独立自由的圭臬，那就离真正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太远了。最奇怪者就是有许多人，他们所操的学术，尽管与政治绝缘，与社会民生两不相干，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不与政治绝缘。他们为争权夺利的功名之念所驱使，一样也可以凭个人私智和申韩之术，去作不择手段的政治活动。反之，如孔子、孟子、顾亭林、王船山等人，他们的学术维系政治的命脉、民族的兴衰，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是超出政治，高洁无暇的。

学者维持学术的尊严，须在学术创造的自身上努力；而不在放任乖僻的性情，抱虚骄的态度。轻蔑政治，笑做王侯，本来是文人习气。许多人都误以为这种习气，就是维持学术尊严的正当态度。我并不是说学术本身的价值不如政治，我也不是说学者尊严神圣的使命，超世绝俗的造诣，没有足以睥睨一切、笑做王侯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学者表面上绝不可显露出笑做王侯、轻蔑政治的虚骄态度，因为这只足以表示乖僻任性带有酸葡萄意味的文人的坏习气，而不足以代表纯正的学者态度，如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普通都引为轻蔑政治的美谈。其实陶渊明辞官归田另有他的苦衷。那时他看见晋室将亡，刘裕将篡，他不愿意作二臣，他实有“不可仕，不忍仕”之苦衷，而并没有根本轻蔑政治、助长文人傲气之意（这是采取王船山独到的看法，见《读通鉴论》，卷十五）。杜工部诗：“本

无轩冕志，不是做当时”，王右丞诗“古人非做吏，自阙经时务”，足见中国正统的大诗人，深知各人的志趣能力每有不同，诗人天才与政治天才有别，自己解释自己对于政治，并没有取虚骄轻蔑的态度。又如周谠溪不卑小官，然而这并不损害他“胸怀洒落光风弄月”的高洁风度。

轻蔑政治的文人习气，既然为诗人高士所不取，所以现代的人更不能够袭取这种态度，作为保持学术自由独立的护身符。而且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政府措施如有失当，你尽可批评，贪吏的行为，你可加以攻击，奸贼的黑幕，你不妨去揭穿，你均不失为一个正直勇敢的公民。现在那些有轻蔑政治习气的人，对于一般从事政治的人，尖酸刻薄，嘲笑讥讽，而对于贪官污吏大好巨憨，反而取幽默纵容的态度。象这样的态度，于学术的前途、国家的前途，恐怕两皆有害而无利。这种脱离政治、轻蔑政治以求学术自由独立的传统风气，在学术上是不健康的空气，在政治上，也不易走上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

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然有不少纷乱，学术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尚未真正实现统一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学术界当时普遍的现象。到了七七事变，抗战建国的国策确定以后，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谘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归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 ■

[【返回目录】](#)

罗志田：大学的精神与定位

[罗志田 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7 月 2 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本文作者罗志田教授

从历史眼光看，今日所谓“大学”，对我们而言，本是一个从外面引进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开始思考办大学并落实在行动上，也不过就是一百年前的事。正因此，从体制到实践，我们的大学或皆仍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不免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面。就连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甚或在教育系统中的定位，都还有模糊不清楚的地方。故所谓大学精神，恐怕也是个很难众皆认可、甚或根本未曾想清楚的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至少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成为不少办学者的准则。

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一般都说他以“兼容并包”治校。这本是他自己的说法，大体不错。不过蔡先生还有所界定，即此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换言之，兼容并包是表现出来的“主义”，思想自由才是其背后支撑的“原则”。仅记住其面上的操作，或可能淡忘其背后的原则。

当年真正参与治校者所体会的蔡元培办学方针，就更重“原则”。1920年11月，北大旅沪同学会在上海设宴欢送校长蔡元培赴法国，曾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致词说：

蔡先生自任校长后，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一则学说独立，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二则思想自由，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弥补缺点，一面保存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者是矣。

陈独秀并不像很多人那样看重“兼容并包”，他眼中的北大“精神”很明确，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当时多对外，针对着“政治问题”；后者偏于校内，侧重于“各种学说”。这虽是陈先生赞扬校长的话，应也能代表文科学长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可贵。陈寅恪特为表出，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今日学者大多记得陈先生的表述，其实他说出的是当年许多人的共识，且已贯彻于大学之中了。

什么是大学的精神？用陈寅恪的话说，大学中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最后一点受到的关注不多，却也决不能忽视。盖有批评态度然后能独立思考，精神独立才谈得上思想自由，故“思想自由”必与“批评态度”相结合。后来担任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就特别要求大学生要“运用自己的思想”，养成“不肯盲从的习惯”，不能轻易被人灌输固定知识，则又是“独立精神”与“批评态度”的结合。



蔡元培及其北大校长委任状

不过这更多指大学内讲学风气的培育，若转而向外输出，长于批评或许就成弊端了。五四学生运动后游学于欧洲的傅斯年，于1920年8月1日给胡适一信，申述对留学界的不满意：不仅一般人急功近利，不重学业；“即所谓人才者，也每每成 politician 与 journalist 之‘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故他“很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就是“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他更希望胡适自己不必太看重提倡白话文等“社会上的名望”，而而努力“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

在大约同时给蔡元培的信中，傅斯年更明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简言之，“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所以他希望蔡元培“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傅函中的“科学”似专指自然科学，但综合两函看，则他所谓“讲学”是泛指指的）。

两函虽皆以建议口吻出，作为前北大学生，傅斯年的直言不讳其实已是今天所谓“提意见”了。胡适那年9月在北大的演讲，就对北大的学问成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了北大“在知识学问这方面贫穷”的现状，其中之一即有“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被他视之为“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强调“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胡适主张把传播“新名词”的“普及”活动留给外面的人去干，希望北大师生“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去做工夫”，即“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

胡适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危机感”，非常可能受到傅斯年的影响（以当年的邮递速度，胡适收到傅斯年函时应已在9月），至少也是与傅斯年有同感。大约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同样不看好北大学生的程度，以为北大过去的毕业生，大都不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基础的普通科学也不曾习得完备。而蔡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既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不免“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可知陈对北大办学的成效，持相当保留的态度。

陈独秀所说，包括今人所谓“自我批评”，因为他自己就曾是文科学长。同时他也在因应胡适对北大学术成绩的批评，两人虽在普及和提高上侧重不同，对北大的评估都与傅斯年相近。他们的共同感受，大致与不少“五四”当事人对学生运动的反思相关，即希望学生回归到求学上来。

类似的现象和观感后来仍在延续，两年后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时，在“游艺、展览和讲演”这些“很有趣味的”表象背后，李大钊看到的是北大“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认为，“本校的光荣”，在于“能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遂“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

可以看出，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是要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的学生。这些或都属于昔人所谓“修文德”的范畴，并奠基于爱智之心。而爱学问、求真理，致力于“纯粹研究学问”（详后），也是大学精神的一个核心成分。在此基础上既传授知识技能，更以学术回馈社会，则是大学的社会定位。

傅斯年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即大学毋须脱离于社会（实际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详后），但即使“为社会上计”，也应树立“讲学之风气”，以为社会“供给学术”，而不是“供给舆论”。

为社会供给学术的大学定位

所谓注重讲学的风气，与大学的定位和宗旨密切关联。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便明言：“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授青年以许多杂俎之知识及片面之技术，乃在一面研究各种理论科学之真理，一面以此研究之所得，造成合己身与宇宙之现象及意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进而将人类“各时各地所发明之真理，贡献于中国之社会”。这才是“大学教育之真目的”，也是“大学对于国民之本来的天职”。

这一表述，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办学方针大体一致，也与傅斯年关于大学应为社会“供给学术”观念相通。傅斯年到晚年仍指责中国的“教育学术界未免太懒”，社会责任感不足——“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但他仍坚持，填补这样的“真空状态”，要靠翻译和创作足以“影响于思想文化”的优秀学术作品。

傅先生还是大学生时，便曾有“造社会”的宏愿，也一直在思考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在五四运动的当年他就提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宋明之季的独行之士和西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学者，皆“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在他看来，那时中国的急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

后来傅斯年先后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晚年时坦承，若从理想言，“大学要尽量成‘乌托邦’”，尽可能“与社会脱离，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去创造新社会”。但他知道那只是“写意的笔法”，现实是大学“不能独自生存”，其“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犹之乎一人不能脱离了人群”。或可以说，要唤起民众对学术的自觉心，先要大学中人对学术有爱好心。但也只有大学中人“有学业鼓舞其气”，才能坚持真理，“不为社会所征服”，然后以学术回馈社会。

学术与社会密切相关，而其关系又是至为曲折复杂的。张之洞早就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社会上民德的盛衰，更与学界文德的修为相辅相成。如梁启超所说，“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要“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所谓“学乃日新”，既是大学对于社会的义务，也是大学赢得社会尊敬的关键。李大钊看得明白：“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当然，以学术影响和改造社会，并非一条坦途。颜元曾希望读圣人书者“要为转世之人，不要为世转之人”，但前提是学者自有其学，足以“转世”。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19年说出了许多人的共同忧虑：“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他认为这还是因为学问方面的努力不足，所以提出，“诸君，倘使看得这社会是应当改革的，还是快些去努力求学才是”。到北伐后，受到喊口号时风的影响，他更喊出了“我们要造成一个‘研究的运动’”这一口号。

“研究”是近代兴起的新词，今日在大学中已广为流行（特别普及于一些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中）；其所指的，就是大学那非教育的一面，也是大学服务于社会的一项主要功能。先后与王国维和傅斯年同事的李济在1954年对其学生张光直说：“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而“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

聚集和培养知识人的大学，不能不是社会的批评者，同时更必须为社会供给学术。今日我们的大学仍以国立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大学颇类过去的士人，其实是受社会“供养”的。故大学中

人若不能“纯粹研究学问”，便无以回馈社会。若他们不存“爱智”的心态和风气，研究便很难“纯粹”，学问也不可能“日新”，又如何能唤起国人爱好学术之心呢。

李济把“求真理的人”对应于工程师和医师，揭示出大学在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包括大学应当是怎样的教育机关，甚至是否仅为教育机关，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

大学中学化：摹仿中形成的偏差

我们今日的教育体系，是以摹仿为主的。但在学习仿效的过程中，却有一些问题或未曾注意，或被更急切的功利性需求所遮蔽了。前引蔡元培所说他办学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这里的“世界”，大体是所谓的“西方”；而当时的大学，更以欧洲为典范（美国的大学体系，特别是本科以后的研究生阶段，那时尚在完善中）。但是，晚清的新教育模式主要采自日本，而日本在摹仿时便已有一些偏于功利的选择。傅斯年注意到：

欧洲的近代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含素：一是中世纪学院的质素。这个质素给它这样的建置，给它不少的遗训，给它一种自成风气的习惯，给它自负。第二层是所谓开明时代的学术。这些学术中，算学、医学等多在大学中出，而哲学政治虽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荡于其中。经此影响，欧洲的大学才成“学府”。第三层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学学术化，此一风气始于德国，渐及于欧洲大陆，英国的逐渐采用是较后的。于是大学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隶于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奖金。

重要的是他指出，“当清末办新教育的时代，这一页欧洲历史，是不知道的，以为大学不过是教育之一阶级”（按“阶级”即今所谓“阶段”，而傅先生所说的“开明时代”，今日一般称作“启蒙时代”）。这是一个关键——不论日本的高等教育如何设置，中国的仿效者仅将大学视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阶段，却忽略了大学第一要自成风气，第二要有哲学氛围，第三必须学术化。自成风气就是能够独立，不人云亦云；哲学的本义据说是“爱智”，美国的多数博士学位均名为“哲学博士”，或许便寓此意；两者均与学术化相关，即大学不仅是个教育机构，它还有特定的功能，就是蔡元培所说的“纯粹研究学问”。前引傅斯年对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批评，显然并非随意，乃是特意点出大学不止于“教育”的一面。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一个不足，或许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过强，尚未真正懂得仿效的对象，就已经设计出了整套的制度。傅斯年来说，“学外国是要选择着学的，看看我们的背景，看看他们的背景”；如“在学校制度上学外国，要考察一下他们，检讨一下自己”。但中国的学习者并不如此，“一学外国，每先学其短处”（部分也因为“短处容易学”）。其结果，“小学常识，竟比美国 College 常识还要高得多”；“中学课本之艰难，并世少有”；“中学课程之繁重，天下所无”；而“大学之课程，多的离奇”。由于章程上求高求美，事实上做不到，“于是乎一切多成了具文”。

这是傅先生 1950 年的描述，迄今仍与我们的教育现状若合符节！我自己初中念了一学期就进入

“文革”了，几乎可以说未曾进过中学。后来曾应邀给成都市的中学历史老师讲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为此而翻阅了全套中学历史教材，深感其“全面深入”。故我演讲时一开始就向老师们致敬：他们第一节课要处理的内容，很多是我到现在都还不敢轻言的。问题在于，这些现象源于“是学外国吗”？去过多国游学的傅斯年自问自答——“外国无一国如此”！

正因早期的创制者事先未曾充分地考察“他们”、检讨“自己”，中国的教育体系虽出于摹仿，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小学的定位虽过高，而大学的定位又偏低。或因未能认识到大学那超出一般教育系统的独立意义，“乃将大学化为中学”。

傅斯年稍早辨析说，“中小学之教育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这个输进及养成皆自外来已成之格型而入，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即“培植学生入于专科学术之空气中”而能“自试其事”。尽管大学也不能“忽略知识之输进、技能之养成”，但“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大学中学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培植攻钻学术之风气”。

竺可桢也说：

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或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于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自动的取舍之能力。

两人均曾任大学校长，做出上述表述时正在校长任上（仅傅先生区分大学与中小学的言说稍早）。从其不同时的共同关怀中，我们就更能理解蔡元培为什么要一再对学生强调“纯粹研究学问”与“灌输固定知识”的不同。也可知中国大学在教育系统中定位的模糊，是一直持续的。直到今天，大学的定位仍不清晰，并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生出了新的问题。

例如，本科教育究竟是偏重素质还是偏重专业，就是一个并未釐清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学仍是相对稀缺的“高等”教育时，即使本科，也是偏重专业的（我自己念书时代就是如此）；目前大学仍属于高等教育，却已是远更普遍的一种教育形式，似乎本科也更偏重素质教育了。但专业“学术的法门”是在大学高年级时教还是留待研究生阶段，便尚乏统一的认识（以史学为例，一些博士研究生连本专业的注释规范都不熟悉，原因就是他们的硕士老师以为这些初浅的技法早已在本科传授，而其本科老师却认为这是研究生阶段的事）。

与大学在社会中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定位相比，专业培育放在哪一级这只是一个小程序，但也可以严重影响大学中的教与学，充分说明了澄清大学定位的重要性。在中国大学初起之时，一方面针对科举时代为做官而读书的旧习，更主要是因应新教育体系中技能培训和研究精神之间的紧张，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和贯彻了一种“君子不器”的办学宗旨。

“君子不器”：大学的办学宗旨

蔡元培一到北大就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在北大每年的开学演说中，他都反复申述这一宗旨（如他自己所说，“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陈独秀 1918 年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也将大学学生之目的概括为三类，即“研究学理”、“备毕业后应用”及“得毕业证书”。他认为第三目的实不足道，第二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只有“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

这是陈先生在文科学长任上时所说，非常能体现校长蔡元培的宗旨。蔡先生从 1918 年起，在反复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为“研究学理的机关”的同时，又一再辨析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他后来更特别提醒北大学生，“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甚至说出重话：我年年重申这样的宗旨，“望诸位自爱”。

由此可知，蔡元培初到北大，针对的是为做官而读书的旧习，着重要纠正的是“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这一弊端。但不久之后，对于学问、学理的凸显，所针对的已转化为资格和文凭；而与“纯粹研究”对应的，则是“贩卖知识”及对“固定知识”的灌输。这表明北大的教育已渐与“科举时代”划清了界限，学校所面临的，已是所谓现代教育体系的新问题了。而陈独秀把“备毕业后应用”与“专门学校”挂钩，更点出一个从晚清以来就困扰着办新学者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从私塾、书院到国子监、翰林院的教育系统，基本贯彻“教书育人”的准则，不主张甚至排斥专门技术的培训。如决讼断狱可能是古代地方官最直接也最繁重的职责，但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中，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清道光十五年，御史易镜清奏请第三场策问加试律例，礼部却以为：“国家设科取士，责以报称者甚多，不独在理刑一端。若于进身之始，先责以名法之学，无论剿说雷同，无裨实用；即真心讲贯者，亦必荒其本业，旁及专家。”

其实易镜清不过要求第三场的五道策问中“以四道论古”，仅“请酌以一道，专取现行律例发问。俾士子讲习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为人所欺”（这是针对衙门里的刑名师爷）。但礼部认为这这一小小的改变也有重大的影响，会造成“以法律为诗书”的后果，给“揣摩求合之士”以“因缘为奸”的可能，导致士习不端，所以不能采纳。

礼部关于“本业”和“专家”的区分，及其与“士习”的关联，最能体现当年培养士人的取向。因为“士志于道”，其所志之“道”，更多是原则性而非技能性的。为官者可以也不得不聘请各种具有专门技能的幕僚或师爷（特别是刑名和钱谷师爷，他们的技术性培训是付诸专门行业的），自己却不一定必非学会这些技能不可。这样一种超越于技术或技能性的“读书”，最能体现“君子不器”的基本精神。

然而在引进的“现代”教育系统之后，“学成任事”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就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当年张之洞主持设计的新学制，就规定小学“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到中学阶段，始准兼习洋文。但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则准其在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习洋文。

蔡元培在受任为北大校长之时起，便也面对着学校毕业生“因无特别技能，无法谋生”这一社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人向他建议应更注重“职业教育”，但他连把“职业科目”参入中国学问的“普通科”都不赞同，仅主张多设与中小学同级的“农工学校，俾无力升学、急图谋生之青年，受职业教育，有技能之修养”。

蔡先生显然沿袭了张之洞的思路，即一面重视“国家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为“急于谋生”的贫寒子弟网开一面。类似的体制，为近些年所实施，不过是把职业教育放在高中阶段而已。然而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大学的一项“任务”。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素不主张甚至排斥专门技术的培训，“学成任事”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仍是一个并未釐清的问题。

回到大学教育那更为基本的层面，蔡元培当年显然秉持着“君子不器”的传统。在他看来，“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或基于这一理念，他不仅想要维护中国学问“普通科”的纯粹，更拟在大学推行以“学、术分校”的主张——

蔡先生特别看重“学理”和“致用”的区别，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两者在学理上“虽关系至为密切”，在教学上却应予区分。他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故“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其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当分立为不同的学校。北大“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或与既存各专科大学合并。盖学与术“习之者旨趣不同”，对学风有实际的影响。北大此前兼设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遂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

最后一语，揭示出蔡元培一再将北大区分于“贩卖知识”及“灌输固定知识”的隐衷，即学与术不仅目的不同、教授的方式不同，连学习的风气也不同。简言之，“研究高深学问”与“学成任事”的技术培训，有着全面的差异，不宜混而同之。不过，这种精细区分学与术的思路，至少在语汇方面影响不广。观蔡先生自己多言学问、学理，而陈独秀、傅斯年等虽分享着他的主张，却频繁使用“学术”以指谓“学问”，便大致可知。今日学术一词远比学问流行，几乎已经通用，本文也不能免俗。

进而言之，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文理基础学科的风气就不能影响应用学科呢？今日我们常常见到，综合大学中应用学科的学生，往往与同专业的专门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同。可知学风的影响是双向

的，主要还看办学者自身的宗旨如何，以及求学者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气。但在当年北大独享“大学”称号的时代，蔡先生确实想为中国办一个更纯粹也更具菁英气味的大学。

恽代英当时就注意到，这样的大学，其实延续了过去的取向。对学生而言，“非国家设立翰林院，则将来何以为生”？恽代英本人颇不赞同蔡元培关于大学“专研学问”而专门则“重实用”的区分，以为“学术而不顾实用、不证之实用，必非实学”。同时，“专门毕业生如能以科学尽职分，其不足者自必勉学，其谬误者自必改正，其研究学术之效必更远且大”。但他确实敏锐地看出了蔡元培的立意。

其实蔡元培的观念也不是他一人独有，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迄今不设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一般人趋之若鹜的学院，或许也是希望维持一种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而非“学成任事”的学风。这一宗旨虽然独特，也广为他人接受，普大在美国的排名，总能名列前茅，但的确是极少数的例外。

据上面多位担任过大学管理者的学人之所述，反观我们今日对大学的定位，很多人言大学教育便常提及的所谓“钱学森之问”，似乎有了某种答案。毕竟“学成任事”本身，是不太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批评态度的。教育没有了“君子不器”的追求，从小学开始，就以课程繁重为特色；而大学上课时又看重固定知识的灌输，轻视学术风气的培植。大学既然化为中学，很难为社会供给学术，唤起国人爱好学术之心，则大学中人不能“转世”而为世所转，几乎也成为自然甚至必然的结果。

从大学的精神与定位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给我们不少提示和启发。进而言之，“学问机关”和“职业教育机关”之间的紧张和取舍，多少牵涉到教育机会怎样才算均等，这问题当另文探讨，此仅略及之。 ■■■

[【返回目录】](#)

徐显明：把尊严和权威还给教师

[徐显明 法理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现为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本文作者徐显明教授

大学如何区别于社会

政治的权威在政党，管理的权威在政府，民主的权威在议会，公正的权威在法院，资本的权威在企业。大学区别于上述组织机构的本质特征是：与五个共同体相对应，她是知识的权威、学术的权威、思想的权威、文化的权威和道德的权威。政治与资本的原则是管理与服从。要么少数服从多数，要么下级服从上级。而大学的原则则是自由与真理。真理掌握世界的规律，正好相反于政治对社会的管理，她运用的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任何真理都首先被少数人所掌握。哪怕掌握真理的只是一个人，其他人都要向这一个人低头。政治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纽带是权力与资本，而大学管理的纽带是知识。知识既产生思想，又产生美德。知识与学术是大学活动的基础——教学是传播知识，研究是创造知识，为社会服务是运用知识，整理图书信息是收藏知识，国际交流是交换知识。对知识和学术的立场与态度是大学制度的源渊与价值标准。大学内的权威不以管理者为代表，而以知识的贡献者为代表。谁能创新知识，谁便是大学的权威。由于知识领域的不同，大学内可以有若干个学术权威。这与政治组织只以上级为权威，企业只以大股东为权威是有天壤之别的。大学之所以需要管理，是为了使各种知识和学术活动相互衔接得更加完善，管理是为知识活动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校长既非知识的代表，亦非真理的化身，他只是为改善学术活动而存在。教授才真正代表知识，代表真理，代表大学水平。

换言之，教授就是大学，校长是服务知识与学术的人。校长与教授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校长不是管教授的。相反，只有教授才可产生校长和决定校长。此亦大学不同于社会组织之特征。

高等教育有哪些基本规律

(1) 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的根本使命。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使多少学生成才便把大学与大学区别开来了。学前教育，是使人认识人的教育，其侧重于儿童良习的养成；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在基础教育完成的时候，受教育者应成为具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意识的合格公民；职业教育是使人成其为匠的教育；高等教育则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研究生(论坛)教育是使才成其为器的教育。使人成才成器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2) 学术创新是大学水平的根本标志。学术分为：传播性学术、整合性学术、运用性学术与创新性学术四种。创新性学术是各种学术的最高代表。创新性学术可以带动其他三类学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高低可以把大学的水平高低分得清清楚楚。能进行学术原创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能跟进与模仿的大学即是二流大学。无创新能力的大学便在三流或三流以下的大学。(3) 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助推社会发展靠科技，而引领社会前进靠思想。大学既应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亦应是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库。(4)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此处的质量观应是全面的质量观，既包括理念、校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质量，也包括生源、师资、办学条件、制度等方面的质量。(5)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作。以学科发展带动学校其他工作的发展。(6) 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办学兴校靠教师，以教师为本位是大学特有的本位观。所谓人才强校，指的是教授强校。(7) 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进步、追求至善是大学的灵魂和精神。(8) 改革是大学发展的动力。(9) 办出特色是大学的目标定位。(10) 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术服务，为师生服务是大学管理工作的目的。此十条，当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大学有无“第四大功能”

1088 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大学的第一功能形成，即大学工作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1810 年洪堡大学成立（今年是其 200 周年），大学的第二大功能形成，即大学除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外，也以科研为中心。由此形成“洪堡精神”。

19 世纪 30 年代，以美国部分设农学的院校及西部地区的院校为发端，把“脚上踩满牛粪的教授就是最好的教授”作为评价标准，开辟了高等教育的新功能，即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相结合，将为社会服务与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大学的第三大功能。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两大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其一是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各国都用国际通行的标准评价大学。其二是大学开始利用特有的优势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促进世界文化和谐。

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在承担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外，正在形成第四大功能——促进文化和谐的功能？把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价值观与宗教等，置于同一个平台——大学，可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借鉴、吸收和融合，进而消除歧解、敌视与冲突，最终达成共识与和谐。该功能，因国家、企业、国际组织等的职能所限而无法承担。唯有大学，才可助其实现。

真正的大国，最终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制度上的被信赖与文化上的被向往，这五大要素的集合，才造就大国与强国。因此，欲强其国，必强其文化，欲强其文化，必通过教育。

把促进文化和谐作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学承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职能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自觉履行第四大职能的开始。随着中国一批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将大幅提高，中国大学主动承担把中华民族文化变为世界所向往的文化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何理解大学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思想体系，而非仅指“科技创新”。大学创新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和基础性。如果把现有的知识体系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四大类的话，那么很明显，它们创新的功能和意义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自然科学所有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创新知识。新知识一经产生，新概念、新规律、新定理、新范畴都会产生。在科学原理的创新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追求新知识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功能，该功能主要由大学承担。对工程技术类学科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方法。所谓新工艺、新流程、新手段等都属于新的方法。工程技术因是对科学原理的运用，所以同一原理可以产生若干运用的方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每一项科技进步，都会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又遗祸于人类。对社会科学学科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思想。每一个新判断，都是思想的萌芽；系列新判断形成理论，理论的系统化就是思想。大学之所以是思想的渊薮，就在于大学的社会科学以产生新思想为存在理由。对人文学科而言，如文、史、哲、艺术等，其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一种文化，即揭示给社会一种更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使人更明确因为什么而生存和发展。

上述四种创新何者更重要？这应视为伪命题。他们各有其重要性。我们不可以其一种为标准，而言其他与之同等重要。因为当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时，实质上判断者已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而将社会科学客体化了。换言之，当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时，这正是在突出自然科学而贬低社会科学了。它们之间关系的正确表达应是：各有各的重要。即科技创新与人文社科创新，各有各

的重要。

除了上述四大类创新之外,大学在创新上的更大贡献,在于她要训练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创新思维。没有创新思维,就没有一切形式的创新;创新思维,是各学科创新的前提。大学培养人的质量,除了德性方面有差别外,其实更大的差别在于不同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在创新思维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创新思维的形成,来源于三个体制性的保证条件,其一为创新者主体性的具备或恢复;其二为创新者具有自由的精神;其三是创新者有怀疑和批判的能力。大学在创新问题上,承担的最根本的任务,是以大学体制所保证的使培养出来的人具有创造性思维。

与创新同等重要的是什么

大学的创新能力决定了其研究水平。与大学创新能力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另一种能力,是大学的守成能力。有无守成能力,是这所大学能否形成传统与特色、价值与精神的关键。也是其是否受人尊重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上(包括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地位之所以越来越低,甚至越来越不像自己的过去,不是因为其创新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其守成能力丧失了。守成对一所大学来说,有三个重要意义。其一,并不是所有学科都以创新为水平标准。对一些学科而言,培养学生的守成能力比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如法律学科。法科学生的第一能力是守护法律的能力,而非其变革或创新法律的能力。再如宗教、道德、伦理等学科,其学科水平也是由守成能力表达出来的。其二,守成对一所大学的传统而言,比创新更为重要。对优良传统而言,创新不是功劳而是灾难。在传统方面进行创新,无异于毁掉传统。其三,守成对大学共同的精神而言,预示着要有十倍于创新的勇气。因为,大学精神是高尚的,是圣洁的,她无时不受到世俗的、功利的甚至公共权力的扭曲和蚀剥,要抵御各种社会侵袭,有时甚至需要守护者作出牺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而守成则是一所大学的脚跟。两者同等重要。

何谓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制度是以大学功能为依据的,保证现代大学各项功能实现的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1810年成立的洪堡大学。该制度的两块基石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表明了大学公共权力即校长权力对教师和学生的界限;大学自治表明了政府公共权力对大学的界限。蔡元培出身于洪堡大学,他最早将洪堡精神和制度带到了中国。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学术自由”发展为“思想自由”。在他校长就职演讲后不久,欧洲就有人评价,中国虽无一流大学,但已有一流校长。大学自治并非不接受政府管理和监督,而是指大学主要向法律负责,只做法律允许的事而不需向政府负责。现代大学制度涉及三层关系:其一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对大学是管理,还是监督,还是允许大学自治?这是大学制度首先要明确的。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是基层自治,其范围为

城乡基层组织的自治，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自治、事业单位自治。大学当在其中。其二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资本对大学的作用。大学的意志是独立形成，还是由出资方决定？现代大学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学校法人制度，明确出资人的财产进入学校后，即为学校财产。学校意志独立形成，不受资本左右。其三是大学内部关系，要明确大学的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与监督权四个平行权力间的关系，每一项权力都应得到其他三种权力的尊重，不允许其中的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更不允许一种权力替代或侵害另一种权力。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是：追求自由，追求真理；制度的原则是：民主管理，人人平等；制度的形式是：遵循契约自由原则的办学章程；制度的目的是：保证教师的学术自由与保证学生的受教育权；制度的特点是：扁平化的，学生与教师与校长是平等的；校长所用的管理手段是依法与依章程办事，以协商和说服的民主方式动员和组织大家迈向共同目标，而非科层式，非强迫或命令式。

如何理解中国大学的“行政化”

中国大学背离大学精神的表现有：世俗化、功利化、工具化、行政化。其中“行政化”被社会关注的程度最高，其对大学本质的损害亦最大。

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知识和真理。大学本质被异化后，其功能正发生变化。她已从“知识共同体”演变为“经济共同体”（各校都办公司）、“利益共同体”（各院都创收，教师都兼职）、“社会共同体”（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职能由大学承担）。欧美大学校长的肩上只有一副担子，而中国大学校长的肩上却有四副担子。我们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追赶正在轻装上阵的世界名校的。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有：

其一，在价值观上，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的一元价值观，已发展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数量至上”等的多元价值观。坚守“学术至上”的教师人数在减少，在学校的地位被边缘化。

其二，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便蔚然成风。这种学术资源配置模式不是大学的发明，而是大学模仿行政部门配置学术资源模式的结果。

其三，大学组织结构向地方党政关系看齐。大学领导班子成员间的关系被地方党政关系模式化，分为一把手、二把手等。在这个模式中，往往先党后政，先政后学，先管理后学术。以党代政，以政代学已司空见惯。

其四，工作机制行政化。科层制替代了大学的“扁平化”。以上下级关系，管理关系来设定组织机制。党管政，政管学，机关管学院，院长管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管学生。大学不像学府而如同官府。

其五，在大学文化上，“民主”“自由”“独立”“真理”“思想”“个性”等最有价值的要素正

被“管理”“统一”“完成”“领导”“贯彻”等替代。在这种文化中，教师的“尊严”，学术的“权威”都要让位于“管理者”。

其六，大学中最大的行政化，是大学承担着不应承担的社会职能。把应向师生员工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由大学承担，如子女上学、住房、医疗、养老等。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应去其不应承担的政府职能。

其七，大学及大学校长亦被行政级别化。

如何去行政化？

其一，回归大学精神，用知识共同体标准重塑大学价值。

其二，改善大学的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监督权设定为平行关系，以界限和程序保证其有效行使。

其三，改造资源配置体制，从教育行政部门做起。改革大学拨款方式，大幅度提高生均定额，将生均定额所占拨款的比例提高到80%左右，将各种“专项”取消或合并。大学内的预算体制与拨款方式亦随之作相应改革，将资源重心从学校移至院所。

其四，将大学承担的其他职能剥离出去，让大学“更单纯一些”。

其五，大幅度压缩教育行政部门中涉及大学的内设管理机构。大学内部也相应减少管理机构。将科层体制变为扁平体制。

其六，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级别。改革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建立职业校长职务保障制度。

其七，用“一把椅子”的理念重构大学文化。一把椅子是指，当某个空间内只有一把椅子的时候，校长不要坐，处长不要坐，学生不应坐，唯有教师可坐。这个理念的实质是把管理观念变为服务观念，把尊严还给教师，把权威还给教师。

如何改进高校的科研体制

目前中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体制只能造就如下两类人：第一类是“会申请项目的教师”。即处心积虑申请项目，但做项目的目的是通过获得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来满足职称晋升或考核的形式要件。这样的科研被称为“无效科研”。其结果是，中国的各种科研经费都在大幅上升，总经费已经超过日本，但创新成果与经费投入之间却并不成比例。第二类人是“会考试的学生”。只会熟背知识，但缺乏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一旦进入社会，各种不适应症就迅速显现。

“重理工不重人文”“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重专利轻转化”“重形式轻内容”“重经费轻成果”的六重六轻是中国高校科研的普遍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科技评价标准设定与对人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

实现从数量标准向质量标准转化的措施有：（1）以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2）以引用率作为评判标准；（3）以对生产力的贡献作为评判标准；（4）以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为评判标准；（5）以形成学派作为评判标准。（6）以是否传世作为评判标准。

完成高校科研方向的四大转变迫在眉睫：

其一，把个人兴趣引导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上来；**其二**，把以学科为中心的科研模式转至以应用和为社会服务为中心的模式上来；**其三**，把校内科研转到行业发展的同轨道上来；**其四**，把中国团队转化成为国际团队。

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办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个远大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应先使大学高尚起来，应使我们的大学回归大学精神。我们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

受人尊重的大学首先应彰显她的德性。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之学重在学统。将大德与大学问集于一身且能代表学统者谓之大师，大师即世之楷模，学之源出。师德决定校德，也决定生德。大学之德不同于世俗者，首在所明之德要为天下储人才，要为国家图富强。要在义利上为社会所崇范。大学失德，首先失在功利与世俗上，失德的大学是无法受人尊重的。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思想性。思想是一所大学的高度，有思想才有真理。社会的进步靠科技，而社会的方向靠思想。有思想的大学才令人向往。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创造性。大学是常新的，她是社会青春与活力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她每天都有创新成果产生。创新是大学表达自己水平最重要的方式。能创新的大学才是社会的发动机。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特色性。特色是大学的魅力所在。有特色才有价值，才不被人所忽视和替代。特色分为软特色和硬特色。软特色如学风、传统、文化与制度。硬特色则表现在学科实力上。所有世界著名大学都是以自己学科特色著称的。办出水平，办出特色，主要指办出学科水平与特色。无特色就难以受人尊重。

把德性、思想性、创新性和特色性统一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办的大学。这样的大学一定是受人尊重的大学。 ■■■

[【返回目录】](#)

梁文道：大学教育的“雾霾”从未散去

[梁文道 香港传媒人，作家。本文转载自 2019-03-29 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本文作者梁文道

最近，与大学高校有关的新闻似乎特别多。

相信你已经听说了武汉大学的“赏樱冲突”；前不久，河北另一所高校内，有学生身着汉服上学，却被学校的辅导员认定是“奇装异服”，甚至发出不换衣服就退学的“警告”。

除此之外，还有一所著名高校里，一位教师被学生举报了，举报的原因则主要在指责这位大学教师上课的内容和方法有问题，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讲授方法。

看完这些新闻和消息，今天我很想和你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正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与「正确」有关的问题？

1. 要求「绝对正确」，只会让课堂本身变得更加苍白

我常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而在这些提问里，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喜欢问我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怎么想才叫正确”，“如何理解才能有正确的认知架构”这样一类问题。

我一向不太会回答这类问题，不是不愿回答，而是我不懂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

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有「正确答案」的呢？

不可否认，当我们对事情形成一套看法，难免会自以为它就是正确的，这是一回事；可另一回事在于，一旦一种学说，一种主张，被认为是正确之后，好像自然的所有围绕它的讲述都必须以它是“真

理”为前提而展开。

于是，在写作创作，尤其是在教学的时候，好像就都必须依循一种唯一的模式去教授学生。

可是设想，我是一位教师，今天要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难道我就不能在课堂里介绍各种反对这种主张的其他观点和学说了吗？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似乎有些年轻人确这么认为。

按照这样下去，恐怕今后所有课堂和课程内容，都将变成一成不变地表述一套学说、观点或理论的「绝对正确性」了。但事实上，从古至今所有的学说和学问，都是在不断争辩之中，逐渐丰满完善起来的。

如果失去了不同的立场和声音，那么这套学说或理论就将变得更加苍白，不再具有生命力。

而且，一套学说或理论里所真正包含的那些复杂的、高妙的、细致的内涵，就再也无法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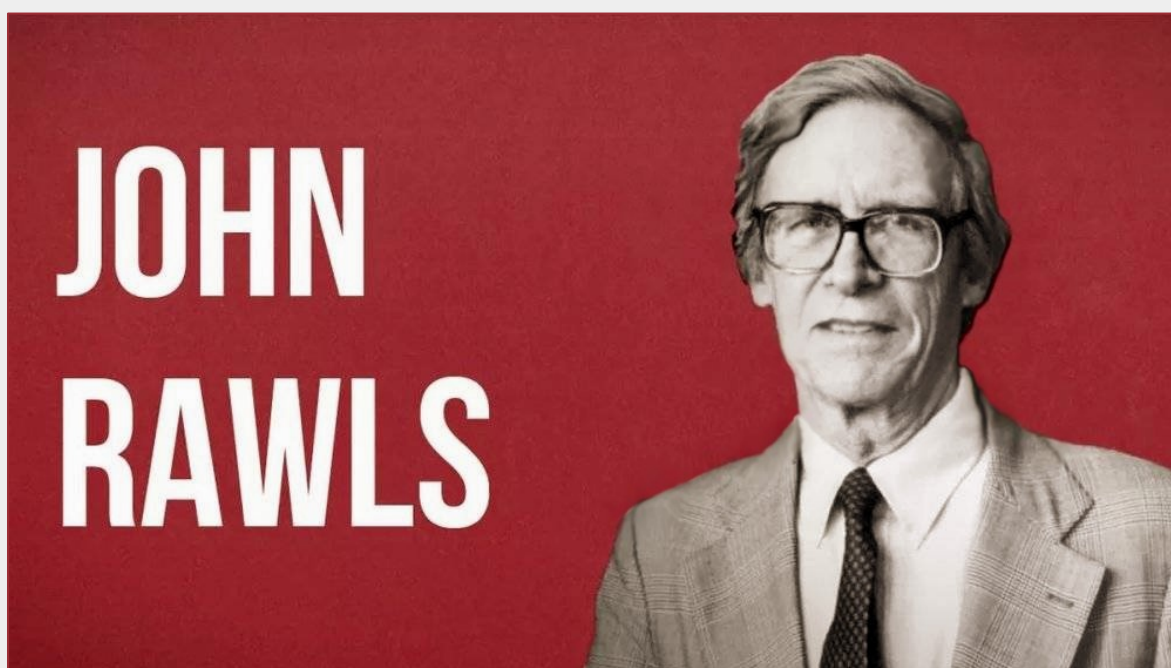
比如儒学的进展，从先秦到汉朝，正是经历了许许多多接连不断的争论而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里的大儒，他们对于儒学的基本理念一致，但都各自发展出独有的特色——这种独有，就是通过与不同学派、不同流派的人争相辩论而发展出来的，也才使得儒学愈加丰富壮大。

2. 先学会为你的对手，作出一番强有力的辩护

事实上，基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社科的学说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必须让学生们去认识到这些争辩的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

为了让这个说法不那么抽象，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

过去十多年，有几位非常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学家相继去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要不断重读这些人留下的著作。其中一位，就是让 20 世纪政治哲学能够重新焕发新生命的重要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罗尔斯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和大学教师，他又是如何教学的呢？罗尔斯在哈佛大学授课时，非常强调一种读书的态度，他对学生们说，当你阅读任何一位过去重要学者著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们在阐述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清，或者论证站不住脚，甚至你持反对观点和态度时，你一定要做到的是，首先为这本书以及这位作者的理论进行最强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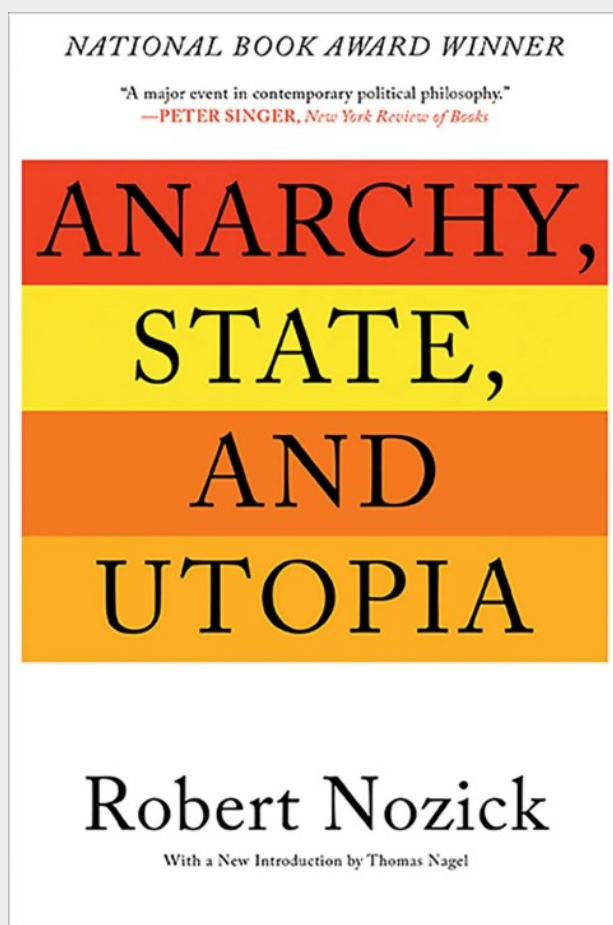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你需要先从这位作者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有问题的论证，把你认为他的论证中存在空隙的地方填满，而不是简单直接地给予否定。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和论证，以及弥补建构你认为的缺失之处。

这个时候再去进行反驳，反对的就是一个最强版本的手，那么你做的反驳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真正有可能站得住脚的。这就是罗尔斯倡导并坚持的一种阅读和辩论方法。

3. 无懈可击的论证，要通过对手的批评来完成

罗尔斯的另一位同事，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读了罗尔斯的重要作品《正义论》之后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也写了一本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这是一本自由意志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罗伯特·诺奇克 著

所谓自由至上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所有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上“最右”的一种想法，认为只要一个人不作出侵犯他人的行为，则 ta 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或其他所有条件去做任何事，是这样一种非常右派的观点。这本著作也写得非常精彩，非常刺激。

当这本书在完成后又刺激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对于今天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都相当熟悉，甚至深受他的影响——他就是已故的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政治哲学讲座教授，G.A. 科恩（Gerald Allan "Jerry" Cohen）。

科恩在读到诺奇克的书之前就曾写下一本不朽的名著，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知道 70 年代的时候，哲学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它在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于是科恩便决定替马克思哲学提出一个辩护，重新解读它的历史唯物论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这本书也存在很多争议，但基本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解读和辩护。

当科恩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读到了刚才提及的与他立场完全相反的诺奇克这位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初稿。

要知道在西方学术界，常有这样一个习惯，当一位学者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常会写成一份初稿，在正式交给期刊发表前会先将这份初稿在同行学者之间相互交传，为的就是收集各方的意见和批评，包括立场不同者的强烈批判，以此能更好地完善修改这篇文章，让它的论证更加无懈可击。

诺奇克的这份讨论稿就被科恩读到了，科恩当时颇受震撼，甚至有点不安，有点焦躁，有几个月的时间科恩几乎天天都在读诺奇克的作品，天天都在思考，以至于他的同行都无法理解。

科恩却认为，正是由于是这样一个与自己观点立场完全相反的哲学家的作品，才让他更能感受到力量和震撼。于是他也觉得自己有义务全力以赴地回应诺奇克，最终又完成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即《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4. 通过不断辩论的过程，理性思辨能力才得以强化

科恩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的另一位朋友，也是牛津大学另一位已故的重要法理学家、法律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他又给了科恩很多意见。

这两个人，尽管一个是自由主义立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彼此都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有着很多保留和不满，但是他们两人一直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还在牛津大学共同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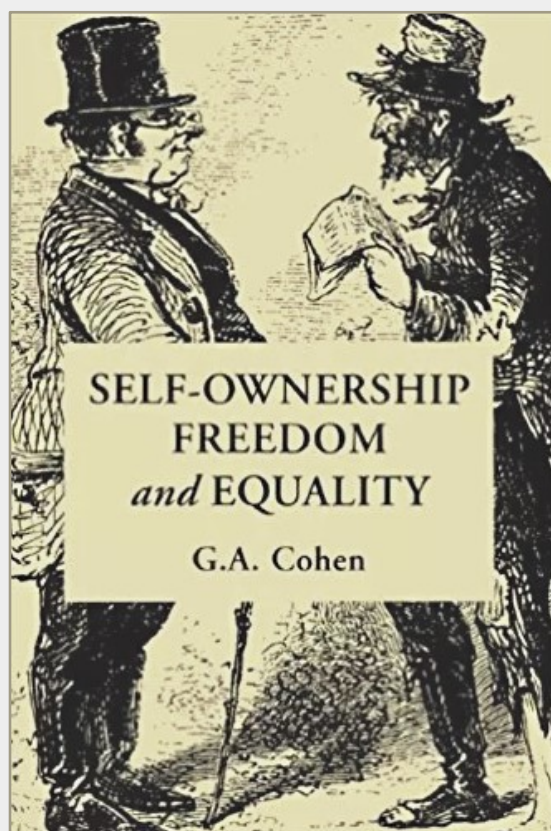
他们在万灵学院的老图书馆开设了一个研讨班（seminar），这个研讨班在我们政治哲学这一行非常有名，俗称为「星际大战研讨班」。

为什么会被称为「星际大战」？其实是因为每一次研讨，德沃金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科恩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两个人总是一同前来授课。

因为双方立场如此不同，在研讨会上就势必产生大量的辩论。辩论的主持者通常是一位相对冷静，能够平衡各方的论点的另一位神话级政治哲学家。这门研讨会有时也会邀请其他同行和学者参加，前

提则是大家的立场都必须不一样。

可想而知，研讨会里的学生们就目睹着这一学术领域内几个“大神级”的人物，相互辩论，大肆“开战”，绝对称得上政治哲学里的“星际大战”。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杰拉德·艾伦·科恩 著

除了能亲眼目睹自己这一行的学术大神们唇枪舌战之外，学生们还为什么如此喜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不断辩论当中，自己才能真正成长，知识才能真正进步，理性思辨的能力也因此强化了，对所有原来自以为读懂的立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不仅能了解不同学术立场的人讨论的问题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所在，还能学会如何回应这些矛盾和问题，由此你便可以理解，这样一门由不同立场的老师们共同开设的课程是多么重要。

5. 道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具有「复杂的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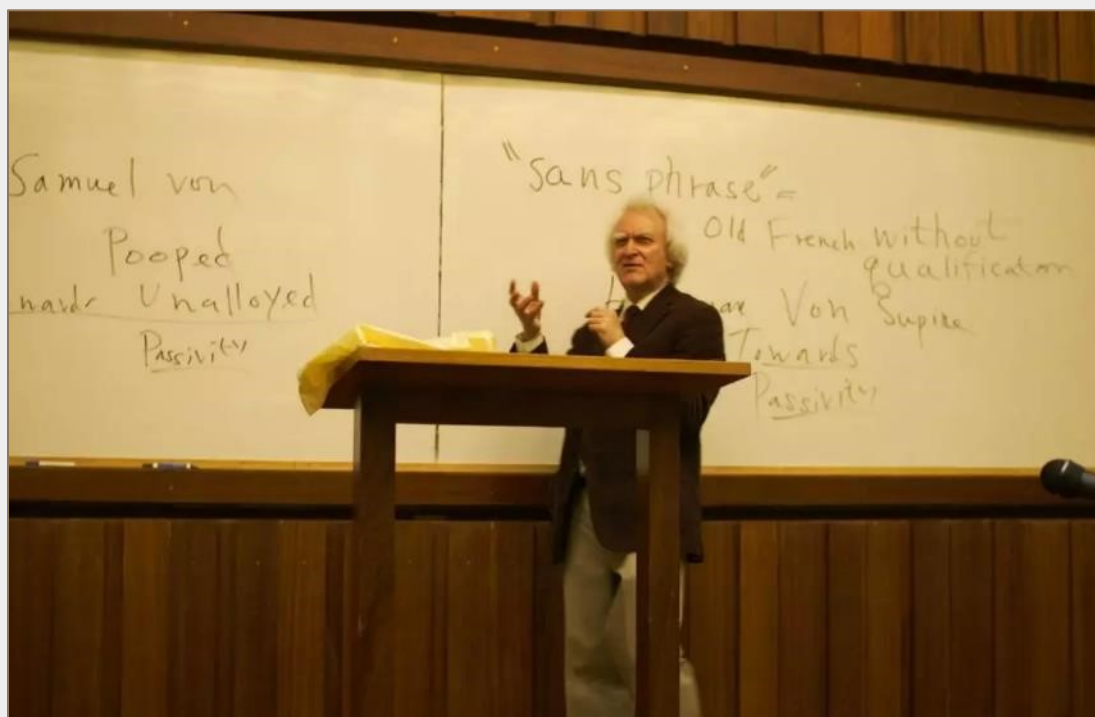
我有一位同学当年在伦敦上学，总是专门到牛津参与这堂研讨会课程。有一回他正好坐在科恩的旁边，那一堂课正要谈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科恩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罗尔斯则是自由主义者，当今天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要向你讲授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你认为他会怎么授课？

难道会带着不齿的冷笑，轻轻几笔带过吗？科恩当然不会。

我的同学就看到科恩翻开了自己面前那本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恩手中的这本《正义论》，每一页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而整本书由于翻阅得太多，几乎都要散架了。

真正做学问的人，真正想要好好教学生学问的人，他们对待学问就应当持有这样的态度——

你有一套自己坚持的理论和讲法，当然可以介绍和讲授。但是当为了论证自己的这套理论和方法时，不能够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应当尽可能地从对手的立场来反驳自己相信的观点，而且要让对手的立场听起来也是近乎完美无瑕，这时候你的反驳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



杰拉德·艾伦·科恩 [G.A. Cohen 1941.4.14—2009.8.5]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也需要给学生提供再思考的基础和空间。每一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就一定要和自己坚信同一种立场、同一种理论吗？当然不。

比如科恩，他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那么多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这些学生里有和他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和他完全立场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都能在学术界里占据一方，成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才是有意义的教育。

而如果一位学生，当发现自己的老师在课堂上对自己讲授的理论提供了许多反驳的例证，就认为是错误的授课方法，甚至举报这位老师有问题，那我只能遗憾地认为，这位学生的大学教育也算是白受了。

到最后，这位学生恐怕就只懂得盲目地跟随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简单道理去做人，去做事，去思考。

可是他却从不知道，一个道理之所以说得通、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它“简单”地正确，而是因为它复杂地正确。 ■■

[【返回目录】](#)

左玉河：学术自由：现代大学独立问题百年审视

[左玉河 历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 2013-06-10《中国科学报》第 7 版]



本文作者左玉河教授

传统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各级官学及书院，而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大学与专业研究所。今天所说的大学迥异于古代太学、国子监、翰林院，它是现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式组织。教授、学生、院系、学科、图书馆、实验室、评议会、出版基金、学报及学术会议诸元素所构成的中国大学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到现在已逾百年。回望中国百年大学历程，我们仍然留有一大梦想：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西方近代大学的核心理念

现代大学既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机构，亦为创造新知识的处所。教学与研究，或曰知识传授与知识生产，乃为现代大学的两大目标。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西方近代大学的核心理念。

中国在移植西方近代大学制度时，蔡元培、胡适等人对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有深刻体认。蔡氏总结北大特色说：“一研究学问。二思想自由。无论何种学派思想，概不干涉。”蔡元培负责起草的《大学令》，将学术研究定为大学主要职责：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此项宗旨成为民国时期大学建构的基本目标。

教授治校：大学评议会与教授会

西方大学制度不仅体现在学科分布、学院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大学独立”之制度设计上。德国大学制度多倾向于设置评议会，由教授们组成评议会，校长一般由评议会产生。该项制度的核心理念为“大学独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均是其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所谓“教授治校”，乃是由大学教授自己治理大学。此项原则实乃西方大学自治传统之体现。中国现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大学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并赋予其重大权力上。设立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实为大学“教授治校”原则的具体体现，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

真正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并在制度上予以保障者，当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设评议会及教授会之尝试，对全国各地大学产生了重要示范效应，其他大学纷纷加以效仿。

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原则的维护

教授治校，保障了现代大学的真正独立，使其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涉，堪称大学“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教授治校”的潜台词，即为“学术与政治之分离”。但在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教授治校”原则也遭遇挑战。1924年初，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设立大学董事会和校务会议，减弱了以教授为主体的大学评议会权力，危及现代大学“教授治校”原则。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各国立大学对此坚决抵制，董事会制度未能实施，“教授治校”原则在这场风波中得以维护。

学术统制：政府对大学的政治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本着“以党治国”原则，加强对各国立大学的政治控制。政府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实行三民主义和党化教育，在大学中开设党义课，推行训育制度；二、以行政手段干预大学教学及学术研究，将政治势力渗透到大学与研究机构中，进行所谓“学术统制”；三、强化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控制学术成果发表出版之自由。国民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干涉，使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出现了职业官僚化、教授营业化、学生政治化倾向，大学“行政化”日趋严重。

中国现代大学坚守的“教授治校”原则及制度设计，与国民政府控制大学的做法必然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清华校长吴南轩之去留风波中得到集中体现。1931年，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接任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吴氏到校以后，积极扩充其个人权限，破坏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原则，从而引起清华教授们的不满。1931年5月28日，清华大学教授们召集教授会，以32票对2票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清华校长吴南轩。驱逐吴南轩风潮，表面上看似一场校长去留的政治风波，但实际上更可视作为中国现代大学极力维护“教授治校”原则的一次正面抗争。

独立与自由：现代大学之魂

“学术自由”之基本意义，是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职之恐惧的自由”。这样的条件和环境，需要制度性的规定加以保障。如果说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则学术独立便是现代大学的灵魂。“大学独立”，成为维护“学术自由”的题内之义。

保持学术自由及学术独立，无法回避学术与政治关系。学术独立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真正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绝对自由。正因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脱离政治影响而独立存在，故才有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学术之关系问题。所以该问题可以表述为：学术研究如何保持与政治的距离？

抱有非政治、非实用、非功利之动机，以探求知识为目的，是对学术独立及学术自由之基本要求。故学术界与政治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抱定“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理念，应划定学界与政界之界域，保持“学界”之相对独立性，与政治上之各种思潮及派别保持相当的距离。

同时，政府不能过多干涉学术研究机构之学术研究，政治势力不能渗透到大学及研究机构中，更不能因此影响学术研究及知识传承。胡适认为，学术研究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力倡保持学界独立与学术自由。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世界学术发展逐渐从“团体运动时代”进入“国家主义时代”，国家倾其全力来发展学术文化事业，学术研究日益纳入了国家战略发展的轨道，学术研究的计划性前所未有地强化，国家权力干预学术研究的强度同样得到了空前强化。

在学术计划性成为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下，如何保持必要的学术自由便显得格外突出。必须时刻警惕政府对学术自由之扼杀，保持学术研究必需的相对独立性。其保持之道，是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来制衡政府的学术统制。

总之，政治势力对学术自由的干预、对现代大学的政治控制、对大学“教授治校”原则的破坏及对“大学独立”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学术统制”。换言之，学术统制是政治势力干预学术自由行为的集中体现。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维护“教授治校”原则和“学术自由”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保障了大学的相对独立和有限的学术自由之空间。但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

“学术自由”，依然是中国现代大学追求的一个美妙理想、一个非常现实的“中国梦”。■

[【返回目录】](#)

盛洪：法治才是核心技术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9-03-29 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美国对孟晚舟及整个华为公司的指控，是对华为公司的重大打击。但对其性质也不宜夸大。例如有些人说，这是一场中美之间的“技术战争”，是因为美国人不愿看到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超过美国，所以打击中国最有成就的高科技企业——华为。仔细想想，如果华为的所有这些“罪名”成立，最严重的后果是在美国及其一些盟国中禁止销售华为产品，但并不妨碍华为在中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以及其它国家销售产品。如果说，这就断了华为研发的路子，就更离奇了。难道华为的技术真是从美国偷来的吗？靠“偷”能够成就一个世界领先的企业吗？反过来，如果以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通过打压华为而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似乎也很荒谬，这是假设美国人也认为，靠偷技术就可以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大国。如果美国人真是这样认为，就不会有美国科技的今天；如果中国人这样认为美国人这样认为，那中国确实赶超无望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靠偷，这很清楚。因为偷总得有可偷的东西，那就是原创的东西。那么原创的东西就比偷的东西要好，创造出原创的东西的方法，就比偷的方法要好。原创的科学与技术之所以能够发展，仰赖于生长的环境。这主要指的是制度环境。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包括自由研讨、公平辩论和开放交流的大学与科研制度，包括公用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制度，也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要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建立起研发团队，这种团队被康芒斯称为“运行中的机构”。对这个概念，我在一篇题为《英特尔的成功与运行中的机构》的文章中说，“用它来形容源源不断‘生产’知识的组织似乎更恰当。……知识的生产表现为一种动态的传统，就像一条不舍昼夜、奔腾流淌的河。它

必须长时间地存在，才会有足够多的机会试错；它必须有积淀下来的传统，才能用试错的代价换来知识的成果，并且避免试错从头开始；它又必须向未来开放，才有不断的创新。”

如果生产知识的团队及其机制是一条大河，“相对于这个不断流动的传统，任何所谓知识产品，不管是学术著作，药品配方，软件源代码，还是计算机微处理器，都不过像是一条冻结的河的一个横截面；任何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不过是这条河中的一个浪花；而知识的生产过程，则不过是这条河存在的副产品，颇像在大河旁开挖的沟渠。”所以，真正的科技能力或者创新源泉是这个“运行中的机构”，而那些已经形成的知识产品，实际上只是这种科技能力中最末端的东西。如果偷技术，就只能偷这种最末端的东西，却偷不走“运行中的机构”及其科研能力，这不仅不能形成自己的研发团队及其机制，也永远不可能走在前面，因为能偷的必然是已经物化的创意，就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在这团队中的个人也不那么重要，即使最顶尖的人，如果离开这个团队和机制，他的知识就缺少与之互补和促进的其它知识，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

所以，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科技的竞争最终要靠制度上的竞争。既然如此，一个企业或国家，最重要的是炼“内功”，即自身的制度环境和科研组织的建立和改进。如此，外部的打压就不值一提。问题是，华为是这样一个企业吗？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吗？如果是，美国政府说华为和其它中国企业主要靠偷技术发展起来的，岂不是血口喷人吗？应该说，问题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思想、学术和文化领域全面开放，建立了摆脱政治干预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制度，同时也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这为我国的知识“生产”，包括公用知识和受制度保护的知识，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框架，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因。2017年，中国申请专利的数量世界第一，占全球的40%。华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年它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居中国第二，高达3293件。比其它中国企业优越的地方在于，华为创建了自己优秀的研发团队，它是“运行中的机构”，它有自己的规则、传统和人员，因而能够源源不断涌现新的技术。

然而，在有关知识“生产”的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同时，我国旧的制度并没退出。它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涌流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将大量本应用于市场中的资金转移到了非市场化的用途中。这就是我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本来，基础研究生产的是公用性知识，需要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资助。世界各国都有类似机制。欧洲各国在17、18世纪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现在各国如美国也有国家科学基金会。再有就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应用研究，有时也需要国家资助，如英国议会曾悬赏确定经度的技术，互联网也是在美国军用网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问题是，我国这个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不仅规模超大，每年高达8000多亿元人民币（比较美国的约2000亿人民币）；而且方向有误，中国的国家科研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不过11.6%（2017，根据科技部数据估计），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则有90%用于基础研究领域。

即使是用于基础研究的部分，也因没有很好的鉴别与评审机制，以致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低。因

为对于如此巨额资金的分配，并不是依据学术规则、市场规则或知识产权制度，而是依据行政机构的分配规则。程序是各个科研组织或人员申请，由评审委员会来决定。由于掌管基金的主管部门的权力缺乏约束，评审委员会多是摆设，互相竞争的科研组织和人员并非只凭自己科研项目的优越来获得基金，而更多地要借助于自己在官场上的资源。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和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批评说，“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有研究者对我国高校科研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整体来讲“高校的科研绩效状况不够理想，只有 38.7%的地区达到了最佳状态，其余地区大多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仲洁，陈静漪，“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16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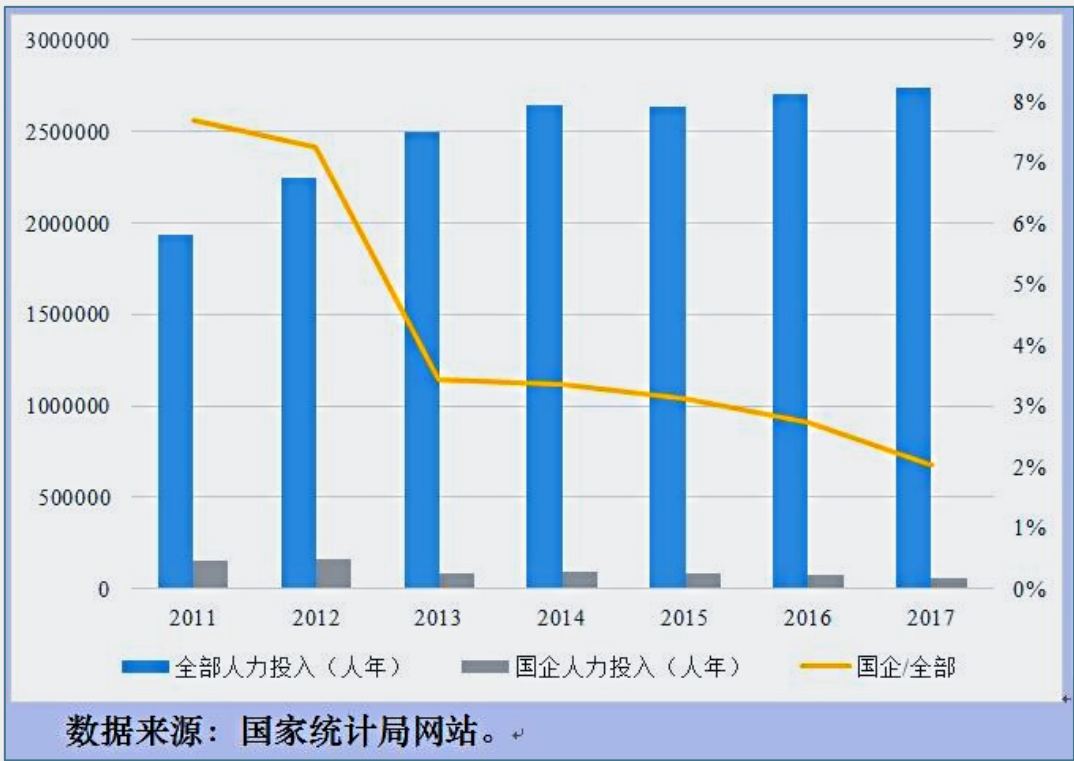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2016 年中国的论文数量已超美国，居世界第一。但施一公教授警告说，中国的论文“垃圾”太多。其原因，就是我国的科研体制是靠政府资金，以数量指标作为评价标准。正如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履行定律”，当价格的衡量单位确定以后，卖方会尽力履行衡量单位的要求，而忽略其它方面。例如，如果只以克拉定价钻石，卖方就不会重视色泽、切工和瑕疵。如果只以论文数量论英雄，质量肯定有问题。评价体系当然可以进一步以刊物的“影响因子”进行等级评价，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定价标准”，又会出现新一轮的“履行定律”效应。不仅中国的大量学术期刊可以互相引用而提高“影响因子”，而且也会因此带坏国际期刊。既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个评价标准，既可带来奖金，也有利于职称评定，还有科研基金，打国际期刊的主意就是自然的结果。

穆蕴秋和江晓原指出，近些年兴起的学术期刊“开放存取”潮流，实质上是以学术为名牟利。尽管不能完全否定，但这与中国的科研体制结合，却形成了一个“愿打愿挨”的循环。在这种潮流下，《自然》、《科学数据》、《科学报告》、《柳叶刀》和《细胞》等国际名刊也都纷纷创办了“开放存取”子刊，用来吸取低端论文的银子，每篇最高可达 5000 美元。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中国。据估计，“2017 年中国作者总共发表了 69051 篇开放存取论文，.....贡献的总费用约为 7.6 亿元人民币。”他们指出，中国论文的比例，在“臭名昭著的 *Tumor Biology* 高达 65.5%，*Oncotarget* 高达 80.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更达到了惊人的 95.3%，简直就是为中国作者量身定制的美国期刊！”（“科学出版乌托邦：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下）”《读书》2018 年第 10 期）。

如果说用于基础研究的国家科研基金的效果不太理想，那么用于商业目的的就会更差。这是因为，基础研究本来就有着理论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科研方案的优劣也较难事先判断。而商业性研究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也容易从市场角度作出评价，但这时如果还是以权力和关系为主进行分配，就会更大地偏离最佳配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我国科研机构的政府科研资金约为 2026 亿元，占其全部支出的 83%；高校的政府科研资金约为 805 亿，占比 63%。由于政府资金的很大部分，科研机构的 82%和大学的 33%，用于应用研究和产品试验，却采取对待基础研究的态度，即不重

实用效果，致使人们在论文发表或专利申请以后，就不再关心了；又由于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缺少市场联系，大量科研成果更多地掩藏在表面的成果数字背后，并不能进入企业和市场。因而成果转化问题一直是我国体制内科研机构的难题。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7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比率约为 35.4%，高校的这一比率只有 22.6%。

而企业是直接面对市场的组织，本应更多地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但这方面，国有企业的表现就远不如民营企业。2016 年，尽管国有及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45%，但投入于研发的人力资源和经费分别只占全部的 7.4%和 2.6%。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逐年显著减少。从 2011 年到 2017 年，人力投入从 148871 人年减少到 55692 人年（见下图）；研发经费从 4678394 万元减少到 2134367 万元。可以猜测的原因是，第一，国有企业更依赖于国有科研机构的研发，第二，国有企业没有研发的动力。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并不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国有企业获得的有效专利只占全部的 3%，也就是说，非国有企业是使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力量。2017 年我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为 13424 亿元，来自市场的资金要远远超过来自政府的资金，按照上述比例，这些资金主要支持了非国有企业的研发。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更适于使用政府基金。在一篇题为“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专利质量提升吗？”的文章中，作者的结论是，“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专利质量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却“未能有效提升国有企业专利质量，相反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由于“政府控制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关键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建

立寻租联系获得超额利润或寻租收益”。作者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专利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加显著；相反，在知识产权保护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专利质量具有抑制作用”（康志勇，《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1期）。这种结论也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较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不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在其内部也缺少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大量发明都被视为职务发明，只给予很少的奖励。

这似乎与人们的印象不同。不是有不少国有企业创造了领先技术吗？国有企业有一个优势，就是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当外国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时，这些垄断国企就以国内巨大市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逼迫外国企业就范。关键在于，当它们以低价获得了国外技术以后，宣称这是“自主创新”的技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技术。在我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高铁是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的文字，但一篇题为“论政府采购对我国高铁科技自主创新的促进”的文章说，“铁道部门代表政府作为采购主体，我国巨大的铁路装备采购市场及铁道部门作为国内市场上最大的、购买力最强的单一消费者，这些因素对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等西方公司同时产生了诱人的吸引力和强烈的竞争压力”，“最终促成了以较低价格引进了先进的高铁技术”（徐稔璿，潘磊，《科海故事博览·科教论坛》，2011）。其中“单一消费者”用“低价引进了先进技术”似已说明问题。

可以认为，宣称某一引进技术是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是相关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在缺乏创新能力情况下贪天之功。据业内人士说，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就是当着领导人和外国专家（他听不懂中文）的面宣布我国高铁技术是自主创新的。但刘志军倒台以后，出现了对他的作法的争议。无论正反，都承认高铁技术是从德法日加等国引进，只是拥刘派肯定他的引进之功，而反刘派则抨击他为了引进而压制国内自主研发。拥刘派说，“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竞相压价，“价格越降越低。”“三年后铁道部招标采购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加藤嘉一，“刘志军是怎么搞成中国高铁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制度背景，知道它们既不可能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甚至也不可能有效利用政府补贴，将引进技术称为“自主创新”的概率就很大了。

如果上面的讨论是正确的，我们就能知道，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科技发展，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大环境下推动的；而我们印象中的国有部门的科技创新，更有可能是“低价引进外国技术”+“宣传为自主创新”的结果。它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维护传统的科研体制，它每年耗费8000亿元以上的国家财政资源，实际效果很差，却是利益集团的蛋糕。尽管这种现象已被科技界与政府意识到，并称国家科研基金如同“唐僧肉”，也有过一些微小改革，但这一体制仍屹立不倒，也许就是这种虚假宣传的结果。但这样做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欺骗了社会和民众，却不想也给外国人一个强烈印象，即中国的科技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并以中国市场为诱饵，强迫外国企业以

低价转让技术。看一看，这正是美国报怨中国“不公平贸易”的一个理由。

然而，中美贸易战带来的知识产权和政府补贴问题，却可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笼罩政府主导的科研体制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简言之，这就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只要末端产品，不要工作母机；只要短期看得见的成绩，不要长期起作用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主导观念下，中国除了建立在统计数字和自我宣传基础上的成绩，永远也不可能在科学技术上走到世界前沿；反而又遭到其它国家在误解基础上的诟病。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将本末倒置的观念再颠倒过来。这本是中国传统的看法。中国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食人以鱼，不如学人以渔”。鱼只是渔的结果，知识产权只是使其形成的制度结构的结果。广义地说，这个“制度结构”就是法治。为什么？因为它提供知识生产和知识产权的全部制度条件。如人身自由，表达自由，通讯自由，财产安全，司法公正，学术宽容，信息开放，企业自由经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条件。

而法治这种“全部制度条件”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与任何特定目的无关，很自然，也好象与科技创新无直接关联。然而这正是它的最大优点。如哈耶克所说，法治的核心就是一组“正当行为规则”，这组规则起作用的条件之一，就是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目的，所以是抽象的，普适的，也具有一般公正性，也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环境的环境。他说，“正当行为规则致力于服务的那些‘价值’，并不是人们希望推进的那些现有实际秩序中的细节，而是它所具有的抽象特征，因为他们发现，正是这些抽象特征乃是人们有效追求无数不尽相同且不可预见的目的的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法治的功效，它在整体上和长远看是最能促进人类各方面目的的性质，才会被急于功利者所忽视。而以违背法治原则为手段进行科技竞争，就是在以输掉大游戏为代价而企图赢得小游戏。正是他们对法治的违背，才使科技永远不可能领先。如果人类智者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关联，我们再愚钝不悟，那就不能总怪祖宗了。

法的英文是 law，就是自然法的意思，包括自然界的规则，也包括人类社会的规则。科技创新也要遵循自然法，否则就缺乏效率。简而言之，科技创新的基本资源就是人脑，而科技创新最根本的模式，就是要形成一种制度结构，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脑中的智慧火花。而人脑是最不可捉摸的资源，究竟从谁的脑袋中，激发出何种奇思妙想，我们是事先不知道的。然而这正是“创新”的本意。若达此目的，这种制度结构就要最具包容性，允许向各个方向探索；最具公正性，让回报最准确地匹配贡献；最具效率，让所有有潜力的大脑都有机会迸发出灵感。这就是没有讨论禁区的、公平交流的学术制度，让创新者根据有用性而努力的市场制度，以及让创新者得到公平回报的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个制度结构下，人们不知道谁将是下一个牛顿或爱因斯坦，爱迪生或乔布斯；但人们坚信，在这个制度结构下涌现出来的创新者，一定会远远超越根据已有知识制定计划的人的想象。

然而如上所述，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的问题，恰恰是依赖于政府分配的资源太多，而借助于学术规则、市场及知识产权制度分配的资源太少。这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过低的问题，还会腐化科研群体，让他们更重权力和关系而轻科研本身。更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体制本身就成为有决定权的人的蛋糕。

他们也许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无效的，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而这些人正是掌有权力的人，他们不仅不会推动这个体制的改革，减少权力分配资源的比例，反而会不断地扩张它。如果缺少对权力的制约，而权力本身就天然具有扩张性，这种扭曲的科研体制就很难改革，因为一旦要减少国家科研基金规模，要约束在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权力作用，就会受到相关权力部门的抵制。而法治，就其本意就是限制权力之意。因为“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与人治（rule by men）针锋相对，即所有人，包括最有权力的人都要遵从法，因而法治是医治这种痼疾的灵丹妙药。

要行法治，就不应将它作为一种实现当下目的的工具，而要注意法治的一般性，用法律正当程序保证的公正性，和可预见的长期稳定性。所谓“一般性”，是指知识产权的完满行使，依赖于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完整制度和综合环境，这就是涵盖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结构。这是因为，公民个人或企业是知识产权的主体，如果公民的人身安全或企业的产权得不到保护，发明创新的收益也就得不到保护。如果我们看到人身自由或企业产权得不到保护时，我们也会联想到知识产权实际上得不到保护。甚至偶然地，这种人权和产权缺乏保护的情况，还会直接伤害到科研本身。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涉嫌贪污公款罪，无论司法如何裁定，最重要的是，此案久拖不决，从2014年起李宁一直遭受关押，没有依法取保候审，让被告承担司法效率低下的成本，则是对人身自由的侵犯。因而，当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孟晚舟案作出反应，抓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也没有取保候审时，则要想到这其实与李宁的遭遇一样损害着中国的科技创新。

第二，法治的目的是公正裁决。虽然科斯定理假定，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法官的任意裁决都会导致资源最佳配置，但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法官的公正裁决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公正裁决也是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配置的重要因素。而要保证公正判决，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遵循法律正当程序。而在中国的现实，这些正当程序经常得不到执行。如法庭裁决经常由“政法委”事先作出，违反法官独立地、不受任何干预地审判原则（《宪法》第113条）；又如在我国屡见不鲜的“电视认罪”，违背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刑事诉讼法》第50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从一开始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在中国政府拘留两个加拿大人之后，长时间不让见家属，也不让聘请律师。联系到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褚健的遭遇，他在看守所守九个月，“被规定不能见任何人，包括律师”，我们就能知道，这不过是违反法律正当程序普遍现象的一部分，这是加于外国人头上的对中国人的伤害，不言而喻，这包含了对中国科技创新及其环境的破坏。

第三，法治需要给人们以长期稳定的预期。只有让人们相信法的规则在未来仍然有效，人们才会以它为标准决定当下行动。一些经济史学家将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归结为“迂回生产”，即生产的周期变长，其中包括创新周期，这需要更长预期的投资决策。成文法的意义在于将基本规则事先昭告天下，让人们有一个大致预期。而在我国法庭，人们不能起诉违宪行为，《宪法》就不能支撑起所有人

对中国法律环境的长期预期。《宪法》第 35 条规定表达自由，但在现实中学术刊物的创立和出版受到了严格限制，出版书籍仍是要审查和许可。《宪法》第 41 条规定通讯自由，但违宪的互联防火墙却阻断像谷歌学术这样的平台，我从国外订阅的学术期刊也曾连续四期丢失。因而不仅是成文《宪法》不能给人以稳定预期，而且直接损害了科研的信息环境。政府经常会为当下目的而不顾法律的长期稳定性，用不透明的政策替代法律，从而作出破坏法律预期的事情来。当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301 条款调查报告》指出的这类问题时，不会因为是涉及对美国企业的侵害而感到陌生，中国企业也似曾相识。

用这样的认识反观孟晚舟及华为案，正确的作法就应是在法治框架下的抗争。既要力争华为和中国的权利，又要尊重法治原则。所谓“法治原则”，不仅是指普通法的原则，也是指现在中国法律原则。从文字表述来看，这两者并无大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实施方面。在大的原则上，都有独立审判，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原则，在程序上都有被告有聘请辩护人的权利，有取保候审的权利，等等。但中国政府的出招基本上是在法律正当程序之外的动作，企图通过法外压力而获一次博弈之胜；而加美政府的出招则是在法律正当程序之内，是要经过程序检验而获久远之胜。结果会很不相同。以违背法治的方式赢得所谓的“技术战争”，其实是破坏了科技发展的基本环境，最终导致“技术战争”的失败。因而，将为华为的努力放到法律正当程序之内，则不仅会增加华为的胜算，而且会改进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制度环境。我们看到，华为已经采取了在法律程序内的行动，包括指责孟晚舟案的“政治动机”，包括对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反诉，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人们说华为所面对的问题是中美“技术战争”时，似乎更看重那些被称作“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末端产品，而严重低估了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保证其有效的法治本身。老子说，“大道至简”；同样，大道必显。吊诡的是，知识的末端产品常常秘不示人，品类繁多，并要求支付费用；而最重要的制度条件——法治，却昭然天下，规则至简，还可以免费赠送。但我国的事实是，没有专利保护的法治知识读本汗牛充栋，但人们并不想用来实施；而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末端知识产品才让人趋之若鹜。其实若要核心技术，功夫在诗外。虽然中国已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并有很大进展，但 2017 年核心专利只占授权总量的 1.6%，相当于美国核心专利的 9.76%（招商证券，“中美专利全方位对比：追赶中的中国专利”，2018 年 7 月 23 日）。差距应多在法治环境。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起步阶段，最佳策略还是要拿来现成的技术。即使如此，中国现在也到了一个转折时刻——是继续摘别人树上的果子，还是自己栽树？恰好，愚笨的美国人又逼着中国人栽树了。让我们将计就计。 ■

[【返回目录】](#)

李炜光：现代治理、现代税制：征税、用税与财富创造

[李炜光 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9-04-03 经济观察网，记者：刘玉海、吴小飞]



本文作者李炜光教授

1689 年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现代政治治理体制以来，财政即是政治的核心议题，甚至可以说财政是现代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每年的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两会”，审议“政府账本”——财政收支报告，都是常规议程之一，也是核心议题。

然而相较于本世纪前十几年中国财政收入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2014 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持续至今；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宏观环境变化，企业和舆论呼吁“减税降负”的声浪此起彼伏。

财税征收和财富创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在税收和企业的可持续财富创造之间寻找平衡，成为中国财税变革必须思考的问题。2019 年 3 月 1 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李炜光。2016 年底，李炜光教授领衔的团队发布了一份中国企业税负调研报告，引发广泛关注。

在长期研究财税史的李炜光教授看来，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确立“税收要处理好和社会财富创造系统的关系”的理念，在税负测算、税种设计、分税制改革、预算公开等领域，尚存巨大改革空间。

在这次访谈 4 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宣布，今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对 2016 年底以来中国持续减税呼吁和 2018 年企业经营形势严峻的回应。

与此同时，房产税立法进程的动向，也引发又一波关于房产税是否应该开征、财政在国家公共治理中的角色问题的激烈讨论——显然，在现代国家治理与现代税制的探索上，中国仍任重道远。

【访谈】

要改变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经济观察报：1月下旬，财政部国库司公布了2018年的财政收支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6.2%，跟GDP增速大致持平，也是2014年以来连续第五年财政增速低于10%，财政增速持续放缓意味着什么？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李炜光：中国曾经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跟中国的税制结构有关，中国实行的是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制跟市场密切相关，而与企业经营和盈利状况的关系比较弱，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财政收入的增速就容易快速提升。目前财政增速下滑这么明显，说明企业、市场这个层面出了问题。

近年来，中央虽然做了决议，政策频繁出台，但企业税负并没有真正降下来。这会影响到企业家的预期，决定接下来是不是还继续扩大投资。从我目前接触到的企业家的反映来看，企业部门的资产回报率这些年持续下降，从2012年以前的11.7%降到了目前的7%左右。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增长缺乏支撑力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中国的城镇化情况不是特别乐观。中国的城镇化进展并不顺畅，农民进入城市只是个打工者，很难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在城市就业、购房、给城市纳税，做一个自立自为的纳税人。现在农村进入城市的“农一代”已经老了，要回到农村去；由于城镇化改革的滞后，“农二代”又难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只能“漂”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个人消费，特别是支付房租，毫无积累可言，也就难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经济增长点在哪儿？不能还寄托在政府的大量投资上、寄托在量化宽松政策上、寄托在房地产上——这些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因为资产的回报率在下降，交不了多少税。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增速还将进一步放缓？

李炜光：有这个可能。所以，国家的宏观政策才会有这么大的调整。中国要实行税制改革——改变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逐步实行以所得税、财产税制为主体的结构，还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给市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资助、补贴等，都是很好的办法。如果这样去做，经济结构会逐渐变得合理，但一些既得利益者就会受到影响。

增值税适合制造业而不利于新兴产业

经济观察报：每次舆论一出现减税的讨论，总是会有诸如“现在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没有多少减税空间”之类的声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炜光：减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各方都很重视。但是我们的报告发布两年过去了，问题还在。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征税、用税与财富创造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税负轻重不是说税收把企业征死还是没征死，而是要确保企业部门的资产回报率保持在一定水平。这个回报率决定着企业家未来的投资，包括风险投资——也就是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创新，政府得把这块利润给企业留出来，不能都拿走。

反过来，如果能够把企业税负定位在一个适当偏轻的水平，会提高投资收益率，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形成资本积累。这又会导致雇佣增加和工薪上涨，而增长的这些就业和工薪变成消费的话，能刺激其他企业扩张，形成乘数效应；变成租金或者按揭的话，能更好的支撑资产价格和债务杠杆。

特朗普减税最大的启发就是：他减的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占比 10% 左右，很低。刚开始，批评者说，特朗普减企业所得税那么小一个税种，怎么不从个人所得税开始减？之前里根、小布什都是减个人所得税。但两年后再看，减企业所得税是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效的。因为，虽然企业所得税只占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 10%，但减轻这部分，对每个企业来说，恰恰就使商业净利润往上增，而那部分钱决定了企业未来投资多少以及敢冒多大的风险去进行投资。特朗普通过减税，给企业充分留利，让企业去发展。而美国企业家的特点就是敢冒险，再给他一点条件，他就更起飞了。而且，美国这次减税有几个政策特别离奇，比如企业购置固定资产 100% 计入成本，没有折旧，从 2018 年到 2023 年，这个政策都生效。未来若干年，美国企业整个设备、技术更新换代会非常快。

这其实就是政府和市场的互利分工，也是从“光荣革命”到“一战”之前英美经济一直领跑全球的秘笈所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只有当这种类型的市场机制稳住以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才是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最近这几年，中国进行了“营改增”，个人所得税也做了改革，但从 2018 年的数据来看，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仍然是增幅比较显著的两个重要税种，你怎么评价这两个税种的改革？

李炜光：营业税改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看着力度不小，也可能对企业产生了某种正面效果，但是感觉力度还不够。

增值税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产业链条很长，上游、下游分得很清楚。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人们消费什么，增值税与这样的经济形态可以相互适应，环环抵扣，对新创价值征税，在流转税里中性算是强的，较少重复征税。这是它的优点。但它在税制设计上，仍存在问题。

首先，现在不是传统工业时代了，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有人叫“消费商”时代。社会生产方式被重构了，不再是教科书中的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以前是生产者在市场交易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生产者决定着生产什么产品，消费者只能在现有产品中决定是否购买，不能参加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环节去。但现在消费者在市场交易关系中越来越处于中心位置，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就生产什么，以往的供需关系被整个儿颠倒、重构了。它不再需要那么长的产业链，不再需要很多的

购置和库存，甚至不需要很大的企业，企业小型化、个性化逐渐成为趋势。增值税与这样的产业结构可能会形成一些冲突。

增值税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支付员工的工资和为员工缴纳的社保并不属于增值税抵扣范围，而是构成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增加值，要一并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的税率又不一样，这会导致企业增值税负担加重或不平等。过去大工业时代，人工成本相较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成本的比重不高，企业对这部分税负尚可接受。但现在市场分工不断细化，企业可能更需要的是程序设计、编程方面的工程师或其他高级人才。人数可能不多，但人力成本却大大提高，这时候尽管增值税税率未变，企业的税负就可能已经过高了。

我们在调研中，有服装制造企业反映，小工序如印花、蕾丝等，需要依靠“小作坊”来辅助生产，但是无法取得专票抵扣，致使企业负担加重。在调研建安企业时了解到，众多中小规模建安企业不得已选择一些不具备开票资格的企业购进原材料，约占总成本的 30%~40%。由于企业无法足额取得进项发票，增值税便构成了企业负担加重的因素。

第三个问题涉及贷款利息。2016 年的营改增把金融服务也纳入增值税范围，而我们都知增值税的特点是需要一个较为完整的运转链条。对于提供贷款服务的机构——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它们收取的利息都要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的原理是把已经缴纳的增值税在下一个环节进行抵扣，以便将其转嫁给购买者或消费者。但是按照现行规定，利息收入缴纳的增值税不得给下一环节开具增值税发票，这就会造成下一环节增值税负的提高（因为它不能抵扣）。这个问题在资金密集型企业，如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中要更严重些。

此外的问题还有，专用发票抵扣链条不完善，导致“走逃”和“连坐”之类的问题发生，也给企业造成很大困扰，增大了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参与调研的企业多次表示，他们均曾遇到过企业“走逃”问题。企业间进行贸易合作，业务、合同、资金流均是真实的，但是当上游企业出现问题，即这个合作链条出现问题时，即使下游合作企业所提供的业务证据是真实的，也要负抵扣链条断裂的“连坐”责任，大家感觉很不公平，也增加了企业负担。

我国实施的增值税制，有别于西方的价税分离，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格成为市场交易的信号，容易造成供求双方因价格提高过快而导致的“无谓损失”的出现——供给方提高价格以实现税负转嫁，导致需求方对过高价格需求量降低，交易量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死角损失”原理。所以，下调增值税税率不是好不好问题，是不降不行的问题。（编者注：4 月 1 日，增值税减税政策落地。根据此前公布的减税方案，此次增值税的下调包括将制造业等行业原有 16% 增值税率降为 13%，将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现行 10% 税率降为 9%，保持 6% 一档税率不变。）

征收房地产税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在谈税制结构调整优化时主张，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并且提到迟早会对

财产征税——房产税和遗产税。最近两年，房产税的各种政策动向尤其引人关注，你对这个税种持什么看法？它的法理性、开征时机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如何？

李炜光：我同意这个说法：中国都是国有土地，向居民征收房产税，本身法理就不够充分。但是，也有人说，有些国家或地区也存在国有土地下征收房产税的情形。法理上是不是有问题，目前，不是真问题；更多的应该是，既得利益在房产税上（造成）的阻力更大一些。比如，有很多计划经济以来的特权阶层占有的房产数量远远高于普通人家，这些房产如果都按评估价值征税，显然他们的持有成本会很高。

如果说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税种，我倒偏向于可以考虑将来建构这个税——这是直接税，而中国现在在直接税比例偏低。这个税的好处是，纳税人可以直接承担税收，难以转嫁，他当然就会关注这个税的用途、去向，有利于培养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再就是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可依靠的财源——开征某些跟地方利益直接相关的直接税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地方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最近，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责任。一般房产税中央政府不能都拿走，最多是跟地方分成。所以，在地方政府缺乏财源、现有的分税制体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将来考虑建构中国的房地产税，我倒是持赞成态度——但要有一系列前提条件。

比如，要从法律上解决房产税归地方，由地方人大和政府共同决定这个税怎么征；房产税的征收需要房产价值评估，应该由第三方机构评估，被评估者如果有异议，可以申诉，申诉得到仲裁仍然不合理，可以诉诸法律，法律有相应的救济条款来帮助。因为如果评估不合理，税负就重，而这个税负是不能转嫁的，当然要较真。中国目前没有这种“较真”的机制，这个税怎么征？要开征房产税，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把流转税的比例降下来，给直接税上升留出空间。

总之，房产税的征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设计上需要非常严谨，管理上非常精细，要有跟纳税人面对面博弈的能力。而中国税收管理目前似乎不具备这个沟通机制，且缺乏征纳双方的平等意识——而房产税这种财产税内涵着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关系。

经济观察报：财税除了“收”还有“支”，2015年中国出台了《预算法》，预算法颁布后，预算问题有实质性变化吗？

李炜光：预算管理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预算的制定、审批、执行、执行结果的评估……所有这些都是政治领域进行的，而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用术语来讲就是：预算是一种外部政治控制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中国现在的预算，在公开性和投票机制方面还有很大问题。

《预算法》2015年颁布实施，到现在为止，实施细则还没有出来。没有实施细则的法律相当于没办法正式执行：出现问题怎么问责？怎么纠错？还是靠行政命令吗？

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

经济观察报：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是中国持续数千年都在讨论的问题。前几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一直呼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

财政改革，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挹地方而注中央”，你觉得中国现在走出这个传统的路径依赖了吗？

李炜光：没有。因此，我希望的财政联邦制——通过以公共责任为轴心的分税制体制来建立从中央到省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权体制，以解决中国财政资源的责任与支配权相适应的问题，短期内是做不到了。

建立真正的分税制（我国省以下没有实行分税制），首先要由法律——国家从宪法、法律上，确定每一级政府做什么事、履行哪些公共责任，并匹配相应的资源、权力。有了法律的明确责任，在此基础上，以责任为轴心来确立体制——做这些事需要哪些资源，体制就是用来解决支配资源的权力归属问题的。换言之，县长做什么、省长做什么，中央做什么，中间是有边界的。而且，一旦确定了这个边界，就不能轻易逾越——因为它是法律性质的，分税制的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权力边界是用法律隔开的。所以，分税制之下，没有中央干预地方、地方上级干预下级的问题，也不能去干预；否则，就是“挹地方而注中央”、“挹下级而注上级”，会造成财政秩序紊乱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

再就是法律的产生，不能定一个法律，纳税人有苦无处诉说。只要是大家自由意志的表达，税负重一点，国民也同意、也认。近代以来，英国税负一直相对比较重，但英国人认这个账。

经济观察报：如果实施你说的分税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之间的财政资源是否会非常悬殊？是不是还是需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李炜光：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已有的财政资源中央先收上来，再根据全国的情况，为了均衡发展的需要，做一点资源的调配。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支配的资源量不宜过大、占比过高。地区的不均衡永远存在，中央统一的调剂、转移支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这个事情上中央管得太多，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未必就有利。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地方差异是可以容忍的，对于贫困地区或者是群体给予一定的救济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一个数量的限定。

经济观察报：如果现行框架下，你说的那种分税制不可能实现，现实而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

李炜光：体制问题倒逼政府必须往前推进改革，那很有可能。改革本来就是倒逼出来的。在改革之前，应该是一系列的改良、局部的修修补补，但修修补补不能替代改革。 ■■

[【返回目录】](#)

朱海就：哈耶克如何看经济学家的使命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文首发于 2019-03-24 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朱海就**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3月23日，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忌日。1992年的这一天，哈耶克逝于德国弗莱堡，享年93岁。他离开我们已有27年，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值得我们不时回味。在这里，笔者想谈一下他如何认识经济学家的使命。

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有一个非常给力的看法，他说：“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影响公众意见，使得今天在政治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的使命是通过“理论想象”，把政治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而不是把给定的政治作为约束条件，在这个约束下追求最优。

因此，经济学家考虑的“现实”并非是否满足当下政治的条件，而是理论上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所以，他才会说“因而，如果有人反驳我的建议现在是不现实的，那也终究不能阻止我继续发展这些建议”。据此，他也区分了经济学和政治家的不同“任务”，指出“决定此时此刻应当做什么”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一、“理论想象”不同于“理性建构”

“理论想象”不同于他一直反对的“理性建构”。后者是构建乌托邦，把自己主观臆断的“好”强加给社会，要求社会按照自己认为的“好”去做，比如计划经济。相反，前者建立在确切的经济学理论

之上，主张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去除不合理的制度，实现改善。

强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体现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一面，这也是他说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证据。为什么“不可能”能够变成“可能”呢？这是因为，虽然人的理性是不足的，但人还是具有通过学习，认识真相与原则的能力，这也是人类仍然可以对自由抱有信心的原因。实际上，也正是“理论想象”使经济学脱离于“政治算术”，与“政治哲学”携手。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5.8—1992.3.23]

哈耶克的“理论想象”与他的演化观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他演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耶克认为，制度是个体在模仿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经济学家其实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因为某些制度，类似货币和相当多的法律在演化过程中受到了权力的桎梏，已经被扭曲了。对此，普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他们仍然会把这些制度视为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接受下来，这样就会强化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时，就需要经济学把它指出来，告诉人们这些制度其实不利于他们的利益，需要予以改变，让制度的演化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也正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在方法论上，“理论想象”意味着不能根据经验现象得出结论，把存在视为合理。一些根据经验总

结出来的观点，比如广为流传的“劣币驱逐良币”，也即“格雷欣法则”是错的。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只有当良币和劣币须以强制规定的比率兑换时，格雷欣法则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在没有政府垄断的情况下，优胜劣汰的法则也适用于货币。

合理抑或不合理，往往需要借助于理论才能知晓。这意味着人们应当区分两个事实，一个是经验事实，另一个是“理论想象”意义上的事实，也即确切的理论告诉我们的事实。经济学家更要知道后面这个事实，指出长远的与看不见的风险，比如人们往往看不到通货膨胀的潜在危害，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家去把它指出来。

二、经济学家的类型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肩负起他们的使命。曾翻译了不少哈耶克作品的华人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1）真正的经济学家，（2）经济工程师，（3）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对照一下，不难发现，第二种和第三种经济学家占大多数。他们更多的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计算最大化。比如经济工程师讨论一些纯技术性问题，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理工性质的科学，比如前段时间网上曝光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类似这种奇葩的研究并不少见。

而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则是为特定利益主体量身定制他们所需要的最优解决方案。如夏道平所说的，“出于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照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经济学的“政治算术”传统也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是服务于国王的数理统计学家。



夏道平 [1907-1995]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政论家，杰出的翻译家，曾任《自由中国》月刊主笔

以上第二类和第三类经济学家的研究属于“工程计算学”。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真正的人。相反，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把人当人。他们认识到人不是任由环境摆布的，而是可以改变环境，把未来创造出来。如夏道平先生所说，“经济学家虽然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动物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正是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使人具有创造性。

哈耶克的“理性不及”以及对理性狂妄的批评已经为人熟知，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他的理性思想中也包括了“创造性”。哈耶克对经济学家的使命的认识正是与此有关：因为普通人有理性，他们有能力判断经济学家的“理论想象”是否合理；也正因为理性中包含了创造性，他们也有能力把经济学家的“理论想象”变成现实。

结语

如果说科学家提供新科技，企业家提供新产品，那么经济学家提供什么？经济学家可以从事一些经济解释和经济预测方面的工作，这未尝不可，但在哈耶克看来，这些工作绝不能构成经济学家的使命。经济学家提供的是“理论想象”，即一个更为自由与繁荣的社会图景与愿景。经济学走在政治前面，是政治的先声，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也是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是经济学的，因为理想的政治就是服务于经济学家揭示出来的图景。 ■

[【返回目录】](#)

茅于軾：回忆我的中学教育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本文转载自民间历史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茅于軾先生

重庆南开中学是 1936 年张伯苓创办的。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国民党政府把首都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

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我也考了两次，头一次没录取，第二次才通过，进了南开的大门。

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

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

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



张伯苓 [1876.4.5—1951.2.23]

中国近代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政治家，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

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控制言论自由。我的一位同宿舍的同学，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控制，被抓去，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来国民党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进而发动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极其不得人心。上海交大发动了“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或政治要求。但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口号适合中学生的理解，容易为中学生所接受，而且学校把这两句话贯彻到行动之中。

允公允能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培养自己的能力，适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允公”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约束自己不损害社会的利益，并且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意思。南开学校的校规是很严格的。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倒是过分关心国家大事，犯了“政治错误”的，被划为右派的特别多。

“日新月异”对青年人来讲特别有意义。青年人每天都应该有进步，每天都是新的，不同的；每天

都要有创造。南开中学特别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打垒球、照相、唱歌、演话剧、做航模、办壁报、应有尽有。



重庆南开中学行政楼前的张伯苓先生塑像

那时我和沈逢吉、张若衡一起办了一张英文壁报，一共出了四五期。为了约稿，我鼓起勇气去女生部联系，说完几句必要的话目不斜视地赶紧回来。南开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完全分开的。平时从来不来往，只有到了有活动的时候才在一起。上演话剧是男女生见面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一睹女同学的风采。我们的这张壁报锻炼了同学们用英语写作的能力。这张壁报上的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很高。这无所谓，只要写了就好，学校领导从来也不过问我们写了什么内容，只有英文老师偶然鼓励几句。

沈逢吉有在中央大学英国文学系当教授的父亲，得到家传英语当然好。张若衡则是班上自学成才的英语状元。他的英语水平超出班上一般水平几个数量级。我们那时所记的单词不过两千多，但是张若衡记的单词超过七八千。他能够不假思索自如地用英语写作。他来自湖南一个贫困家庭，身体很不好。他最怕上体育课。毕业以后听说他患了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治疗肺结核的药，所以肺结核是十分致命的病，尤其对于贫困的孩子而言。我非常担心他的命运，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南开的课外活动特别多，但是正课仍然是主业。几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用功，没有一个马马虎虎的。但是要考试及格并不难，因为几门主课的老师都非常好。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做习题，及格就没有问题。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抗战，流离失所，所以一共上了八所学校。回忆起来，凡是老师教得好的课，我都有兴趣。相反，老师不好的课，都成了我害怕的课。因为听不懂，还要考试，怎么能不害怕？南开的特点是没有让我害怕的课。



青年时期的张伯苓

我念完中学念大学，风风雨雨经过了七十多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南开为什么能够给我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现在中学的问题那么多？过去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目，现在回忆起来才感觉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意义。

他一辈子从事教育，不断思索如何办好教育，改朝换代，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那是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他在一生中直接教育的人数达十万人，间接受他教育的（他的学生的学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来教育的）达到一百万人。

教育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因为朝代不同而不同。我们有时候把一切都政治化，把教育生硬地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其结果是教育不能适合青年人的具体情况，不能满

足青年人的切身要求，最后是事倍功半。不但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耽误了一代青年人。

张伯苓办学校丝毫不墨守成规，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又能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困难。他采用董事会治校的办法，一方面把教育办成产业，合理收取学费，不但使得办学能够有持续性，而且还能越办越大；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募捐，多方面筹集资金，还能帮助家境清寒成绩优秀的学子能上得起学。



1937 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生合影

他一生办学不用公家的钱，他办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保持其独立性。可惜他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发展。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重新被发掘，被研究。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愿意献身于教育的仁人志士，更多的人懂得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不受干涉的办学环境，让他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学习张伯苓，超过张伯苓。时代在前进，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教育如果还不能急起直追，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值得担忧的。 🍷

[【返回目录】](#)

金雁：集体失语的时代

[金雁 著名东欧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川雁塔]



人们自发悼念匈牙利事件的死难者

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无疑是“脱苏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证件”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 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 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而知识分子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空疏之论多可落实的操作少。每次大的政治事件过后，统治者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这根绳索可以用来“套人”但是绝对不能依靠。于是就会他们便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胡萝卜+大棒”并行两手，使该阶层趋于分化，一部分变成了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

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进入主流后，他们集体失语的“快速转向”造成了“责任感缺失”和“扬善除恶”环境逆转。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上下层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疾苦。

在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祖国独立的波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文化阶层从来

都是民族的代表，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政权需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

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阶级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地群众性剥削压迫声讨环境中无地自容，纷纷加入到自我羞辱贬损的行列里以求得到接纳。在“人民民主”时期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对他们又是致命的一击。



1956年10月，布达佩斯

但是很快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人从“帮闲”发展到“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在精神上被自我消灭”了。在一个主流价值观虚伪的体制下，下一代的记忆是缺损和扭曲的，缺乏集体反思、社会道德思想的“矮化”便在所难免。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务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这些风向标人物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影响不可估量。

麻木冷漠的常规化

社会高压和钳制导致人们的普遍冷漠化。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不能苛求他们，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质疑现行政策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人们大多会承认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



纳吉（中）在1956

一般来讲，从有道德责任感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边缘化一个是声名显赫，一边是穷愁潦倒，一边是吃不完的“人肉馒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家人受到威胁。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识时务”而“汇入主流”的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

这时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就会容易出现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这个阶段示范效应下，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得到精神升华、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里，几乎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尚存一定的“是非观”，但“祸从口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更重要，唯唯诺诺的“从众心理”，习惯随大流逐渐便丧失了自我。

这时往往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

——道德感发生故障，从客观上自我说服、自我逃避占了上风；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安逸的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对人的意义和生命目的追求都退出了。

当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本土执行者“丧失良知”，一叶障目或者假装不知道社会真相。这种社会如同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倾向于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和对“小我”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的追求。在离群索居的环境下，人畏缩到没有选择的角落里，害怕被进一步孤立而为将自由的权利让渡给统治者。

不只是纳粹和 SDL 主义会促使这些条件，其实当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真相时，这种机制就产生了。那些残暴行为可以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只是机械地贯彻命令，而后形成紧跟形势以上级的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中的不道德性产生矛盾。

另外民众也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大词忽悠和裹挟进去，“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把国家利益提到超越一切的基点上，把外界“妖魔化”、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可以激起人们的仇恨和冲动，邪恶大释放。



哈维尔

社会道德于是发生畸变。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

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

哈维尔在 1990 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上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 40 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潜入地下的思想界回答是：首先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的“无脑化”状态，要打破“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

他们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颂扬国家的天赋”，不断地把 D 神化，似乎“只有这一‘救世主’才能挽救国家”，说到底不过是暴力革命的傲慢变成了血统的傲慢。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

多年的宣传洗脑和整人运动，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能导致个人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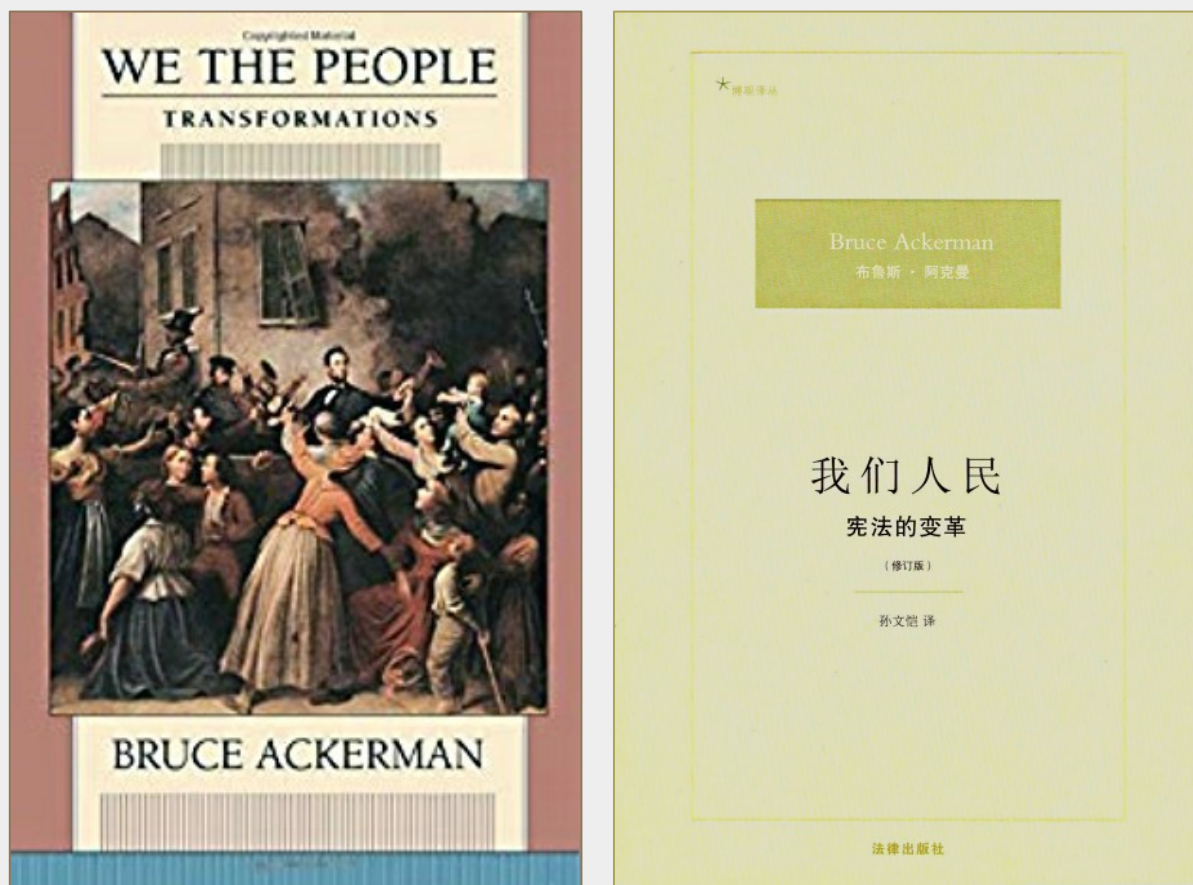
以前古希腊时代，国家也曾有过自由人保护神的阶段，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不过是统治者的需要。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看，民族、国家、政党的团体认同并不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与生俱来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

人的思想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谁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属于每一个人，它从来就不是权力的婢女，不是任何人的恩赐。 ■

[【返回目录】](#)

肖雪慧：“我们人民”：国家命运的最终主宰者 | 谈《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

[肖雪慧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首发于《云南大学学报》2005 年 3 期]



《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 法律出版社

这厚厚一本大书，是布鲁斯·阿克曼所著美国宪政三部曲的第二部。三部曲共同拥有一个庄严而又洋溢着豪气的书名：《我们人民》。它就源自美国宪法的著名序言：“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备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治安，筹设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并谋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孙永享自由生活起见，特制定和确立这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不足百字的序言不仅开门见山宣示了制宪根本目的是谋人民世代永享自由生活，而且声明该宪法乃由“我们人民制定和确立”。这样的声明在世界各国宪法中是罕见的，但它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空头声明，更不是被任何权力机构冒名发布的。制宪和批准宪法过程中美国人民切实的和决定性的参与证明了“我们人民制定和确立”绝非虚言。而且，美国人民并未因为已经通过立宪确立了指导美国日后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就从宪政发展中消失，而是在日后的重大宪法变革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正是《我们人民》第二部“宪法变革的原动力”所揭示的。

作者通过考察建国时期的宪法改革，尤其通过重点考察由内战和新政促成的两次重大宪法变革，扣人心弦地展开了美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美国政治生活的广阔图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讯息。置身另一制度、有着全然不同体验的人很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迪。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之处有三。



布鲁斯·阿诺德·阿克曼 [Bruce Arnold Ackerman 1943.8.19 -]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和政治系教授；
《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一书的作者

一．政治生活的二元特征对公民政治热情的保护

作者指出，美国政治生活有常态政治和宪法政治之分。常态政治在过去已确立的基本政治原则指导下靠代议制维持运作，“政治的中心舞台被那些满足于对现存体制进行渐变性修改的政客和党派把持着”，民众主要通过定期参加投票更换代表和领导人的方式表达意志，对渐变过程作最低限度的参与。宪法政治是这样一种情况：发展了的政治现实出现突破既有宪法原则的趋势，政治家们在宪法观上严重分歧和激烈冲突，此时，民众被发动起来就指导公共生活的原则进行持续争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成熟判断，并通过在各种层次选举中的投票最终决定宪法改革的命运。

宪法政治是大众政治，在民主性上高于常态政治。但这种突破政治生活常态的情况只在极少时期出现。就是说，作为特殊政治形式的宪法政治只在罕见的必要时启动，绝大多数时候是常态政治。常态政治下，绝大多数国民，如果愿意，可以对国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进行自由的思考，可以警惕地盯住

掌权者，也可以摆脱政治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把国家政治事务留待民选政治家处理。即使美国人民最关心的防止权力僭越、确保人民自由这一根本问题，常态政治下也有可以使人民大致放心的双重保障：一是依靠结构性的权力多元和相互制衡制度来防止政治权力的专横，把各权力机构或党派的自利倾向及其危害控制在人民可容忍的范围内，二是周期性选举使政府各权力部门不得不顾及选民的预期反应，不敢懈怠和越轨；此外，结社自由和新闻、言论自由作为随时可以起作用的力量也构成重要保障。

这种设计基于对人性二重性的理性认识。人既有利己诉求又有超出私利的关切，一般说来，绝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主要精力是放在自身事务上的。二元政治尊重人性的现实，包容了人的天性中利己、冷漠的一面，又给人超脱一己私利而热诚关注国家前途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它对人民的政治激情和道德感寄予希望，但并不对此抱不切实际的奢望，不轻易诉诸人民的政治和道德热情，而只在必要时这样做。

使公民通常间歇性和潜在地参与政治的二元体制，保护了公民的政治热情和道德热情，使之在需要时可以勃发出来，在事关国家政治的根本问题上真实地和决定性地发挥作用。一些国家的历史则表明，如果动辄诉诸人民的政治、道德热情，反而会使这种热情由于过度燃烧而枯竭，当需要人民积极参与时，却只能报之以厌倦和漠然了。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到二战初期这一个半世纪中就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现代极权国家则一方面滥用和糟蹋人民的政治和道德热情，另一方面把人民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这些国家热中于用制造出来的伪政治对人民进行无止境骚扰，人民无止境地要就无数问题作政治表态，真实心声却极难表达，更别说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了。人民的政治、道德热情因持续地被误导、愚弄和扭曲而丧失，但又无时无刻不被政治字眼和制造出来的政治运动所包围，于是，表面政治亢奋状态下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与擅长表演性政治激情的普遍虚伪便如形影相随。对人民的福祉来说，这种状况无疑是灾难性的。

二．对抗性政治下冲突的建设性

美国继承了西方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就开创的把反对派及其斗争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宪政原则，并使之发扬光大。据我看，罗马开创的这一原则主要是通过具否决权的保民官这一设置来体现的，而美国政府几大部门之间分权制衡的对抗性设置和内在包含于宪法中的批判性因素使得把反对派纳入体制的包容性可以体现在制度的各个方面甚至各个环节。例如，最高法院不仅有着与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相对抗的传统，而且其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也经常激烈冲突，但在形成它那些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和法律的种种主张时，最高法院又有着综合各种见解连同反对意见来共同形成其主张的传统。而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随时相互攻讦的党派更使对抗日常化。

美国的对抗性政治格局下，冲突是常态，但也是有序的，冲突双方遵循着共同的规则，守着共同的

底线，而且当一方取得优势时，另一方凭借宪法拥有进行反对的强有力政治武器。作者重点考察的重建时期和新政时期宪法变革，鲜明体现了这些特点。

这两次变革都是在改革派和反对派的激烈交锋中实现的。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当国会中激进废奴的共和党人提出挑战种族歧视偏见的宪法第 14 修正案及相关法案后，保守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一再动用否决权进行反对。双方在是否确认黑人的美国公民身份问题上激烈互动，使一个具根本性的宪法问题呈现出来：究竟以种族因素还是政治因素（以肤色还是以忠于或背叛合众国）作为确定美国公民身份的要素。罗斯福新政时期，坚守自由放任主义宪法传统的旧式法院顽强抵制积极干预的国家政府，使新形式下如何界定美国政府的目标和组织方式成为不可回避的宪法问题。在这两个时期的宪法斗争中，保守派和改革派最终都诉诸人民，由人民来决定宪法改革的命运，两次最终都因人民的支持而实现了宪法改革。而“人民的支持”，不是任何一方可以自封的，这是由选举中人民给以改革派无可争议的胜利来证明的。

选举结果裁决了反对派的失败，但对宪政发展来说，反对派的作用极其重要。他们基于维护宪法传统的立场进行的抨击、警告使改革者不能规避过去已确立的宪法原则而自行其是；他们与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和激辩把改革派试图采取的突破宪法原则的举措强行推入公众视野，激活了人民在常态政治下处于休眠状态的政治思考，迫使人民思考奴隶制问题，思考宪法原则有没有因为积极干预的国家政府而被侵袭，迫使人民带着这样的问题走向投票箱；激烈反对带来的持久争论深化了对宪法精神的理解，它构成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过程中，不同意见共同参与了对宪法的重塑……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冲突把问题置于民众面前，使改革派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人民，更不可能撇开真正的主权者而越俎代庖自行决定改革方针和改革幅度。是反对派的斗争促进了宪法改革成果的民主化，改革则由于经受了严峻考验而获得坚实基础。

对宪政发展来说，革新派的努力赋予宪法以变革、更新的活力；反对派的斗争则使改革不能伤害最根本的宪法精神，并把改革派对宪法的重新解读和更新规导在自由主义宪法传统之内。两派的互动，使宪法得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抗性政治格局下的冲突，意义不限于宪法改革，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具普遍意义。它使国家的任何重大决策都不可能在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而斗争各方无论冲突多么激烈，却都循着斗争、妥协的艺术，不弄个鱼死网破；都严守不可逾越的斗争底线：最终诉诸选民，服从选民的裁决，败北的一方不会宣布选举无效，更不会诉诸暴力，但保持将来重提问题的权利。

这种把反对派纳入体制的政治现实对人民也极具教育功能。在大大小小的冲突呈常态的政治现实下，人民不论旁观还是介入，都于无形中在接受着民主社会的公民素养训练，如尊重观点、主张的多元化局面，对反对意见的包容心态，通过对话、论争寻求共识。

如果说古罗马开创的原则使反抗因合法化和制度化而被疏导到和平、理性的方向，避免了暴力反

抗和暴力反抗的破坏性后果，那么，在美国的对抗性政治格局下，反对派不仅构成社会纠错机制的要素和使社会保持动态稳定的力量，他们的主张和斗争还丰富了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制度的包容性保护了整个民族的智慧，为多元表现的政治智慧提供了在相互砥砺中发展和表现的制度空间，从而有利于产生建设性结果。而在制度性不容异见更不容反对派的地方，是另一种现实。原本可以成为政治上宝贵财富的反对派及不同意见被浪费掉，而且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防范和对付反对派上，甚至耗费于防民之口。这种对精神、智慧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往往因所谓“稳定”的需要而成为必要并且常规化。但即使社会似乎是稳定的，也是这种以压制人的智慧和社会活力为代价的虚假稳定，在稳定的表象下积累着重大的社会危机。

三. 选举的宪政功能

民主政治下，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按程序定期举行的选举，对人民来说，是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和进程的最重要手段；对国家，选举表明人民是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的同时，也就提示了政府本质上是一种信托。人民通过选举这一途径对政治的参与虽是间歇性的，但选民的预期反应使选举对政府构成根本性约束，所以定期选举是使政府向人民负责的基本保障。

在布鲁斯·阿克曼展开的美国政治生活图景中，选举无论是作为公民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和进程最重要手段，还是人民授权的方式和过程，都展现得真切而生动。特别在宪法改革时期，选举把“参与”、“影响”和“授权”、“约束”的基本宪政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发挥了超出常规政治下选举的更广泛功能。这更广泛功能至少有如下方面。

首先，特定形势下的选举结果发出了宪法改革的信号。1860年，持有解放黑人这一在当时具革命性主张的林肯赢得大选是如此；罗斯福在1932年大选的胜利也是如此。

其二，在不同宪法观的激烈冲突中，人民对领导人的选择就是对不同宪法纲领的选择。1866年的中期选举，将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这次选举核心纲领的共和党人赢得胜利，以既有宪法条文为依据反对给予黑人平等公民权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他所代表的保守派遭到了毁灭性失败。这一选举结果对于人民支持宪法修正案的程度是有效检验。

其三，选举是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交流、对话。不论常态政治时期还是宪政时期，选举均有此基本作用。但宪政时期藉选举进行的互动、交流、对话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作者在分析政治精英和大众进行有效互动的程序时指出：选举给了具不同宪法观的政治精英向民众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引导民众参与到宪法讨论中；民众通过投票表明立场，选举结果又反过来指导政治精英下一步如何提出宪法讨论主题；政治精英在下次选举时把宪法讨论主题提交人民讨论和表决；以此类推（201页）。

经过上述程序，人民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形成的宪法意志仍然通过投票来表达。

由上可见，宪法改革时期的选举实际上成了美国人讨论和决定祖国命运的主要方式。

选举要能够承担前面所述“参与”、“影响”和“授权”、“约束”——或者说是公民选择和指导政府——的基本宪政功能，而且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讨论和决定祖国命运的主要方式，这选举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选举，它的一切程序和过程充分公开，选民有充分选择自由。美国保障信息公开的新闻自由制度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任何部门或派别对选举进行黑箱操作的可能；写入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对公民选举权的运用起着配合、支持和保障作用。

如果没有公开性和选择自由，没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配合与支持，所谓选举不过是愚弄人民的闹剧。它有两特点：黑箱操作和无选择余地。这种要人民在给定名单上画圈的虚假选举与宪政民主南辕北辙。走向投票站的人民有参与之形而无参与之实；选择和指导政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通过投票解决宪法争端更是神话，实际情况是，不论制宪或修宪过程，人民都被当成了植物人。而且，一个政权能够按其需要把人民定期赶往投票站，这一事实还表明国家权力的无制约状态，表明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空间的侵犯和吞噬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它使民众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旧时皇权下的臣民，臣民好歹可以不受诸如选举闹剧中充当傀儡之类反复折腾，好歹可以休养生息。

四．结语

布鲁斯·阿克曼以“我们人民”命名他的宪政三部曲，可谓名至实归。显现在美国宪政发展历程中的“我们人民”具体、生动、有力。它不是任何权力机构或野心家可以方便利用和玩弄的抽象名词，在这类名词下，构成人民的千百万个体是被虚幻化和湮灭掉了的，权力中心可以方便的以“人民”的名义反对人民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甚至反对人民的全体；而真实的人民却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虚幻、分散、无权而在高度组织化的政权力量面前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而布鲁斯·阿克曼书中的“我们人民”，就由那些在利益、价值、生活追求上千差万别，拥有多种方式和渠道表达自己意志，也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着对政治参不参与、多大程度上参与的公民组成。如果需要，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结社、集会和选票真实地表达意志，真实地参与不同利益或诉求的博弈过程。无论最终结果是否符合各自的预期，自己的意志都加入到结果的产生过程之中。可以说，“我们人民”乃是凭借一些基本手段组成和维持了一个自治社会的公民的总体。

在人民尚处于被监护状态，正待走向自治的地方，“我们人民”的经验是革命性的。 ■

[【返回目录】](#)

九璃：尼古拉·普桑的两幅 Et in Arcadia Ego

[本文首发于 2016-08-31 微信公众号：文博艺术旅人]

尼古拉·普桑 (Nicolas Poussin) 画过两幅以 Et in Arcadia Ego (按照拉丁文的语法直译是 “Even in Arcady, there am I”) 为主题的绘画。

Et in Arcadia Ego I 绘于 1627-28 年，三个牧羊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着，突然在路途上遭遇了石棺和骷髅头，还有刻在石棺上的那行字：Et in Arcadia Ego，看起来比较有冲击性和戏剧性。



阿卡狄亚牧羊人 (1627-28) [油画] 尼古拉·普桑 [17 世纪法国画家] 英格兰查兹沃思庄园 藏

这有点像是一幅虚空派 (vanitas) 作品，以 memento mori (拉丁片语 “记住 (你将会) 死亡”，绘画中特指象征生命无常的意象，例如骷髅、烛火等) 为题材的画，强调某种道德警示：生命转瞬即逝，切莫虚度光阴。

Et in Arcadia Ego II 绘于 1637-39 年，同一个主题，普桑的表现方式却很不一样。骷髅头不见了，几个牧羊人在这幅画中分散站在长方形石碑的两侧，对于这座坟墓他们的表现非常平静，最左边的牧羊人甚至产生了冥想式的哲思。



阿卡狄亚牧羊人 (1637-39) [油画] **尼古拉·普桑** [17 世纪法国画家] 法国卢浮宫 藏

Arcady/Arcadia 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的名字，传说中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原始而单纯的乐园。因此 Arcady/Arcadia 就代指乌托邦，中文翻译为世外桃源，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 *Eclogues* 中、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 Jacopo Sannazaro 在他的 *Arcadia* 中都称颂过它。不过到了普桑生活的十七世纪，Arcadia 一词的含义似乎变得有些复杂了。

Et in Arcadia Ego 这句话有迹可循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与普桑同时代的画家 Giovanni Francesco Guercino 的 *Et in Arcadia Ego* (1618-1623)。



阿卡狄亚的牧羊人 [油画] 1620 年 **格尔奇诺** [17 世纪意大利画家] 罗马国家古代艺术画廊 藏

这画中就明晃晃地表达了这种警示：两个牧羊人在 Arcadia 遭遇了一只巨大的骷髅头，而画面之外的观者就像他们一样，被这只骷髅头和它所暗含的死亡意象吸引了全部注意力。骷髅头被放置在一个底座上，底座侧面铭刻了一行文字，从牧羊人的角度看看不见；这文字就是给画面之外的观者看的。上面刻着：Et in Arcadia Ego。

欧文·潘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在 Et in Arcadia Ego: Poussin and the Elegiac Tradition 一文中解释道，这句后来经常出现在文学或艺术中的 “Et in Arcadia Ego”，按本意应理解为 “Even in Arcady I, Death, hold sway” (即使在世外桃源，死亡依然掌控着命运)，而不是 “I, too, was born, or lived, in Arcady” (我也曾生于世外桃源)，后者是误翻，不符合拉丁文语法。



尼古拉·普桑 [Nicolas Poussin 1594.6.15—1665.11.19]自画像 [油画] 1649 年
17 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画派重要画家

也就是说，这句话原本其实是在警醒人们，你们到头来是要死的。它有点像是人们开始否认对于 Arcadia 的乌托邦想象，在这个原始的社会中有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的挫折和苦难，其中当然也包括死亡。

潘诺夫斯基认为，对 Et in Arcadia Ego 的理解随着普桑在 1650 年创造性的构图而被广泛地误读

了，而这或者是普桑有意为之引导观者的误读。在这幅画中，没有骷髅或石棺这样的能直接暗示死亡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方形石头似乎有意回避了此类联想，死亡这一主题的视觉性被削弱了，而这几个牧羊人并没有身处被突如其来的坟墓惊吓和警醒的戏剧性场面，而是带着好奇在探询石头上铭刻的文字，更像是参观一处名胜。画面中明亮的色调甚至令人有种田园诗歌般的遐想，仿若回到了 Arcadia 作为乌托邦代名词的浪漫想象。

他们更多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埋在这坟墓中的人；他们更多想到的不是自己也会像这个人一样死去，而是这个人也曾经像他们一样活过。重要的不再是代表死亡本身的坟墓，而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

之后的画家们，就这么跟着普桑的创造性误读一去而不复返了。



素描作品 卡尔·威廉·科尔比 [德国素描大师]

在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Carl Wilhelm Kolbe 笔下，刻着 Et in Arcadia Ego 的墓碑已经成了能够渲染情侣约会气氛的背景装饰物。

而 Fragonard 直接省去了坟墓的发现者，虽然破碎的石棺暗示了死亡，却有如婚礼上火炬的光芒照耀着它。恋人们或许已经生死相隔，但是爱意切切实实地存在着。

为什么处理同一个主题，普桑会有这样的转变？

随着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的推行，古典主义美学复兴，普桑在 1624 年到达罗马以后与古典主义艺术家来往密切，自身也逐渐接受这一美学倾向。古典主义的推崇者不喜欢古怪阴暗的意象，例如骷髅头什么的。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Et in Arcadia Ego II (1637-39)里就再没有了 Et in Arcadia Ego I (1627-28)中放在石棺上的骷髅头。

普桑也在意大利诗人 Jacopo Sannazaro 的诗歌中得到了新的启发。他把石棺改成了方形的石碑，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读到了 Sannazaro 笔下的方形石碑：“And they shall read on the beautiful square monument the inscription that chills my heart at all hours...”（他们读到的这漂亮的方形石碑上的文字始终让我寒心.....）



吻 [棕色墨水 黑色粉笔] 1785 年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 [18 世纪法国画家] 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 藏

除了这些之外，普桑自己是否有什么心境上的转变？两幅画作相隔十年，他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否有所不同？

潘诺夫斯基总结说，从 Guercino 开始是 “Even in Arcady, there is death”（在世外桃源也逃不过必死的命运），而到了 Fragonard 则是，“Even in death, there maybe Arcady”（即便在死亡中，或许也有世外桃源）。普桑和他的两幅相隔十年的 Et in Arcadia Ego，正是这场逆转的重要节点。 ■

[【返回目录】](#)

网文：辛弃疾的剑和词，南宋的一曲慷慨悲歌

[本文转载自 2018-07-30 搜狐历史]



辛弃疾 水墨肖像

醉里挑灯，长剑泛着幽蓝的光；轻弹剑身，化作慷慨悲歌。要拭干扬州路上苦难的泪，要饮尽佛狸祠下胡虏的血。那确是一把好剑。

在诗山词海中遨游了许多年，看过了李白的金樽，看过了李商隐的锦瑟，看过了李清照的莲舟，但最夺目的，还是你的这把剑！剑气中，映照着你那双充满愤怒和期待的眼睛。

当年你驾骏马疾奔南下，匡扶宋室时，腰中佩的就是这把剑吧？当年你和耿京意气相投，举酒起誓要将金人赶出大宋，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书案上放的就是这把剑吧？当年你率十八骑夜闯敌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时，手中挥的也是这把剑吧？它浸润着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锋利如许，锐不可当！

你南下报国，满腔热血，但是一次次的上书请战却毫无效果。你听着江北百姓痛苦呻吟却无能为力，你看着官场的黑暗、朝中的排挤和皇帝的昏庸，南宋的朝廷已容不下你的热血和忠勇。

你从山东大汉沦落为江南游子，于蛙鼓声中，稻花香里，举杯独酌，却是饮不尽的国仇家恨。于是岁月和酒杯终于蚀钝了你的宝剑！

终于，你认清了一切，梦碎了，心碎了，志却未残。没有了“列舰层楼”，没有了“投鞭飞渡”，没有了“金戈铁马”。可你还有如椽之笔，于是你以血泪为墨，继续书写你的铁血豪情。

你登上京口北固亭，看着满眼风光，想的却是千古兴亡。你大声唱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你也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为国效力，然而终究报国无门。



往事悠悠，英雄往矣，只有这无尽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你也只能轻叹“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你登上郁孤台远望，忍不住在造口壁上挥毫落墨。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家国沦亡之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在笔底流淌，忠愤之气，在你的弊端展现。但是朝廷苟安江南，血性已失，你空自哀鸣又有何用呢！“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没被淹没在朝堂的倾轧之中，也许这已是英雄最好的结局了吧！

但是你却不甘安逸和沉沦，你的酒中分明还藏着刀光剑影，你的琴里还弹奏着塞外之音，你的梦里依然有的卢在飞奔，弓弦在炸响。你的心中藏着年少时的那把剑，你把它溶入了墨中，写在纸上，刺穿了历史。后人已听到了你胸中宝剑的轰鸣，就在纸上，在你的文字里！

我们读你的清江水，读你的浩然正气，读你的民族尊严。

读懂你忧国忧民的愁思，读懂你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是却读不懂你目光之外的迷惘。

你凭栏远眺的身影，凝重了一段历史，丰润数不尽的时光。



多少次梦回沙场，泪湿枕巾。金戈铁马如石如山，压抑着你的呼吸。

梦里，你呓呓低语，好男儿当飞度关山，踏碎冰河，收复江山。

可怜青山无数，朝廷昏庸，壮志雄心早已随风飘散。

郁孤台上，你一声长叹，叹华发早生，家国末路。

你就像天地间的一只孤雁，交游零落，云飞风起。只有天上的明月，陪着你酣然入醉，不离不弃。

你的战场不在南宋，你的热血，你的豪情，只适合在历史中流淌。你不够洒脱，你痛苦，你迷惘，你绝望，你大声呐喊。你改变不了时代，但你独一无二！

醉里挑灯，长剑泛着幽蓝的光；轻弹剑身，化作慷慨悲歌。要拭干扬州路上苦难的泪，要饮尽佛狸祠下胡虏的血。那确是一把好剑。

在诗山词海中遨游了许多年，看过了李白的金樽，看过了李商隐的锦瑟，看过了李清照的莲舟，但最夺目的，还是你的这把剑！剑气中，映照着你那双充满愤怒和期待的眼睛。

当年你驾骏马疾奔南下，匡扶宋室时，腰中佩的就是这把剑吧？当年你和耿京意气相投，举酒起誓要将金人赶出大宋，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书案上放的就是这把剑吧？当年你率十八骑夜闯敌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时，手中挥的也是这把剑吧？它浸润着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锋利如许，锐不可当！

你南下报国，满腔热血，但是一次次的上书请战却毫无效果。你听着江北百姓痛苦呻吟却无能为力，你看着官场的黑暗、朝中的排挤和皇帝的昏庸，南宋的朝廷已容不下你的热血和忠勇。

你从山东大汉沦落为江南游子，于蛙鼓声中，稻花香里，举杯独酌，却是饮不尽的国仇家恨。于是

岁月和酒杯终于蚀钝了你的宝剑！

终于，你认清了一切，梦碎了，心碎了，志却未残。没有了“列舰层楼”，没有了“投鞭飞渡”，没有了“金戈铁马”。可你还有如椽之笔，于是你以血泪为墨，继续书写你的铁血豪情。



你登上京口北固亭，看着满眼风光，想的却是千古兴亡。你大声唱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你也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为国效力，然而终究报国无门。
往事悠悠，英雄往矣，只有这无尽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你也只能轻叹“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你登上郁孤台远望，忍不住在造口壁上挥毫落墨。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家国沦亡之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在笔底流淌，忠愤之气，在你的弊端展现。但是朝廷苟安江南，血性已失，你空自哀鸣又有何用呢！“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没被淹没在朝堂的倾轧之中，也许这已是英雄最好的结局了吧！

但是你却不甘安逸和沉沦，你的酒中分明还藏着刀光剑影，你的琴里还弹奏着塞外之音，你的梦里依然有的卢在飞奔，弓弦在炸响。你的心中藏着年少时的那把剑，你把它溶入了墨中，写在纸上，刺穿了历史。后人已听到了你胸中宝剑的轰鸣，就在纸上，在你的文字里！

我们读你的清江水，读你的浩然正气，读你的民族尊严。

读懂你忧国忧民的愁思，读懂你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是却读不懂你目光之外的迷惘。

你凭栏远眺的身影，凝重了一段历史，丰润数不尽的时光。

多少次梦回沙场，泪湿枕巾。金戈铁马如石如山，压抑着你的呼吸。



梦里，你呓呓低语，好男儿当飞度关山，踏碎冰河，收复江山。

可怜青山无数，朝廷昏庸，壮志雄心早已随风飘散。

郁孤台上，你一声长叹，叹华发早生，家国末路。

你就像天地间的一只孤雁，交游零落，云飞风起。只有天上的明月，陪着你酣然入醉，不离不弃。

你的战场不在南宋，你的热血，你的豪情，只适合在历史中流淌。你不够洒脱，你痛苦，你迷惘，你绝望，你大声呐喊。你改变不了时代，但你独一无二！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 年 3 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 年 3 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 年 4 月,「**铁路改制: 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 年 9 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 年 10 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 2015 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 3 万元 (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9-2020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